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近代烟台教会教育研究（1861—1949）

姓名：马金智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赵兴胜

20081015

中文摘要

鸦片战争后,受“福音奋兴运动”(The Evangelical Revival)影响的大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借助不平等条约的庇护,相继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作为传教事业发展的基地。而烟台是山东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地理位置及气候环境都很优越,因此来烟传教士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由于传教困难,传教士不得不开始借助教育促传教的方法,以打开传教局面。他们开办了各类教会学校,招收学生,并借此传播基督文化。教会教育的开展,客观上推动了烟台近代化的进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为社会培养人才。本文主要通过描述传教士在烟台的教育活动历史,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梳理线索,分析教会教育在1861-1949年间各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发展状况和特点,各教会学校对烟台早期教育现代化历程的参与程度,并综合评价教会教育对烟台社会及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1861年烟台开埠,先后有17个国家在此设立了领事馆,传教士纷至沓来。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教会相继在烟台开办学校。其中基督教会创办的占多数,尤其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对烟台近代学校的影响最大,如文会馆、益文学校、启暗学校等都是由其创办。至20世纪30年代,烟台共有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业等各类教会学校20余所,学生众多,设备齐全,颇具规模。

自19世纪中期至1949年间,教会教育历经了发端及早期发展(19世纪中期至1900)、完善(1900-1921)、改革(1921-1937)及衰落与结束(1937-1949)四个阶段。教会学校的开办,为解放民众思想、传播科学文化、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等作出贡献,客观上为烟台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开办学校只是为其文化侵略开辟道路,所以教会教育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总之,教会学校的命运随着烟台形势变化,成为烟台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因素。

教会学校一开始就具有宣道与教育的双重功能，有必要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教会学校多方面介入了烟台的经济、科技及社会生活中，把西方社会具有近代意义的科学知识带到了中华大地，从而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挑战，激发了中国人的变革意识，推动了烟台的近代化建设。烟台教会学校在整个教会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近代烟台教会教育及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有重要的补充和例证作用，对我国教会教育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烟台；来华传教士；教会学校；启暗学校；益文商专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ousands of missionaries, influenced by The Evangelical Revival, came to China. With the aid of unequal treaties, these missionaries established many churches in the coastal treaty ports as their preaching bases. Yantai, as one of the earliest treaty ports, has a superior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climatic environment, which made Yantai attract more missionaries scattering in a wide range. Owing to the difficulties in preaching, these missionaries turned to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preaching situation, thus they established various church schools to admit Chinese students. And this is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m to propagate the culture of Christianity. In f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kind of church education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Yantai's modernization, accelera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ultivated qualified people for the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depicting the education activities of missionaries in Yantai. Basing on the collection of massiv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analyzes church education's background, development and features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from 1861 to 1949 and its effects on the process of Yantai's modern education. Then it is a comprehensive comment on its influences to Yantai as well as the whole China.

In 1861, Yantai became a treaty port. Since then, 17 countries have set up their consulates in succession, followed by the com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missionaries. Schools were set up by Christian and Catholic churches, of which the Christian church is in the majority. Especially the North Presbyterian Church mad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Yantai's modern school, such as Wenhui Guan, Yiwen School, Qi'an school and so on. Until the 1830s, Yantai already had had more than 20 schools including kindergartens, primary schools, junior high schools, senior high schools, vocational schools and so on. All these schools were well equipped and in large scale with numerous students.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1949, the church education experienced 4 stages: the start and early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1900), the completing period (1900-1921), the reform period (1921-1937) and the declining and termination period (1937-1949). These church schools contribute greatly to liberate people's mind, sprea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ulture and transform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of traditional China, thus it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Yantai's modernization. However these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mainly for the purpose of spreading Christianity in order to transform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These schools were only used as a tool for their cultural invasion, 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its limitation. In short, the destiny of church schools changed with Yantai's situation, making itself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in Yantai.

Church schools have the function of both preaching and teaching from its first beginning and hence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needed. These schools affected Yantai's economy, technology and people's life in many aspects. It also brought modern western technology to China, which challenged Chinese culture and inspired Chinese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reforming. And this in return promoted Yantai's modernization. The church school in Yantai is, to some extent,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research of church education. Therefore, i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and illustration to the research of the church education in Yantai and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as a whole. Also it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church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Yantai, missionaries to china, church school, Qi'an school, Yiwen Commercial School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马金智 日期：2008.10.30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印刷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马金智 导师签名：赵兴旺 日期：2008.10.30

导 言

(一) 选题意义

鸦片战争后,外国基督教差会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和传教士自身的努力,乘西学东渐之风,相继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建立教堂,作为传教事业发展的基地。面对传教过程中的重重困难,19世纪中后期,传教士们不得不开始借助教育促传教的方法,以打开传教局面。他们在教会的支持下,广泛设立学校招收学生。教育手段成为西方基督教会传播教义、扩大影响的重要媒介。正如传教士们所说:“没有教育作为媒介,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的传教努力是最为劳而无功的”。^①

烟台作为近代山东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之一,开埠以来吸引了大批的传教士,在19世纪被发展成为影响较大的新教传教区。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他们建立了一批教会学校,包括中小学及高等学院,分普通、商业、实业、医学、启暗、神学等多种教育种类,层次不一。而教会学校的设立,有效地促进了近代烟台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思想的嬗变,成为西学东渐的“文化载体”。

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9世纪中期至1949年这段时间来研究烟台地区的教会教育发展情况。在此期间,传教士们在烟台地区创建多所教会学校,教育活动情况复杂,影响也较为广泛,在烟台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教会教育的发端及早期发展(19世纪中期至1900)、完善(1900—1921)、改革(1921—1937)及衰落与结束(1937—1949),教会学校的命运随着烟台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经历了兴起、繁荣和衰落的不同阶段,成为烟台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著名的学者费正清曾说:“研究在华传教士是了解中美关系的主要钥匙”。海外学术界不断的推出这方面的新成果,如果我们能够对烟台地区相对比较典型的传教士进行考察,对于今天的中外文化交流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近代来烟传教士为教会教育的开办做出了努力,并多方面的介入了烟台的经济、科技及社会生活中,在整个传教士史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此进行细化研究,挖掘新史料,对近代烟台教会教育的研究,对中国近代教育史及地方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的补充和例证作用。此外,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具有宣道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对于此类教育方式,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从而为我国教

^① 中国美国学会编:《“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

会教育历史的研究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研究现状

1、关于传教士活动的研究

最早开始来华传教士历史研究的是十九世纪来自欧美的传教士，他们利用各教会的年度报告以及某些传教士所撰写的回忆录或传记进行研究，自19世纪开始先后出版了大量的宏观历史手册。其中，著名的教会史家赖德烈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成为在华传教史的经典。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对传教士的研究成果已有一定数量，国内学术界，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第一部以近代来华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成为较有影响力的著作。但书中仍坚持“文化侵略模式”，并未详细介绍和评价传教士的文化、教育出版活动及其影响。90年代后相继有顾卫民《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熊月之《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近代化》、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吴梓明《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著作，对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他如史静寰的《基督教与中国知识分子》、周宏宇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教育发展》、高时良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事业》、谢必震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妇女》、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等作品，则从科学教育的角度论述了基督教功能。在港台学术界，有林治平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等著作，强调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的推动力量。

另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王立新的《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①、李喜所的《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②、罗志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③、崔丹的《晚清寓华新教教士与近代教育》^④等，对于传教士的活动，尤其是教育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2、关于地方传教士活动的研究

随着对传教史的深入研究，九十年代，有些学者开始尝试从地方学的角度研究传教士活动，从而产生了一批区域性基督教研究的著作。如陶飞亚的《基督教与山东社会》^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考察基督教会在山东地区所从事的各项活动及其影响，影响较大。其他如雷雨田的《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⑥、伍昆明的《早

^① 《近代史研究》1995.03。

^② 《历史研究》1998.02。

^③ 《历史研究》1996.06。

^④ 《近代史研究》，1990.03。

^⑤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

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①、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②、余三乐等主编：《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③等作品，也主要着眼于某个地区的传教士活动，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研究和评述，可以算地方传教史研究中的代表作。

相关的论文也有很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或者传教士活动比较频繁的内地主要城市。比如山东地区，张书丰的《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九十年》^④，在1862—1952年间，以担当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重要角色的教会教育为切入点，对山东教会学校九十年发展历程、传教士办学的目的和方针，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和评价。其他如朱冬梅的《西方基督教与近代山东女子教育》^⑤、魏娜的《基于山东教会学校解读近代中西服饰交流现象成因》^⑥、刘春华的硕士论文《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近代山东西医科学》^⑦、朱小俐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女传教士在山东活动述论》^⑧等，推动了山东传教士活动史的细化和专业研究。

3、关于烟台地区传教士活动的研究

虽然烟台是近代传教士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但对于此地传教士活动的研究却相对缺乏，仅在一些综合评述的作品中有所涉及，如章开沅等主编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史教育》中，对于登州文会馆及狄考文有相应的说明。从整体上看，缺乏专著作品。仅有曲拯民所著《烟台教育发展史话》（1865—1945），但属非卖品，所以影响不大。近年来，随着地方基督教传教史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以烟台传教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以及硕士论文，对于深入研究烟台传教史有积极的作用。如邓云的硕士论文《来华传教士与近代烟台社会变迁》^⑨便较为全面的论述了烟台开埠以来的传教士活动，如来烟传教士人数、传教士的各种活动及其影响等。其他如陶飞亚的《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⑩、刘再生的《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⑪、郭大松的《晚清外国传教士云集登州及其原因探析》^⑫、辛俊玲的《近代烟台教会学校述论》^⑬、郑连根的《狄考文和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⑭；滕

^①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④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12月。

^⑤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⑥ 《纺织学报》，2007年第5期。

^⑦ 山东师范大学，2004.10。

^⑧ 山东师范大学，2001.04。

^⑨ 华中师范大学，2005.07。

^⑩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⑪ 《音乐研究》，2006年第3期。

^⑫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⑬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

^⑭ 《春秋》2007/06。

松梅的《基督教会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①、赵海涛的硕士论文《美国在烟台的传教事业》^②、等，都以近代传教士在烟台的文化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

至今，学术界对烟台传教士活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在这个领域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尚待去挖掘，从而对于近代烟台教会学校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目的

当代史学界对于传教士活动的研究已不断深入和全面，但是就烟台地区的传教士教育活动来说，相关的论文往往流于表面，只有简单的记录和汇总，并未对烟台各个时期教会学校的情形及发展变化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述，再加上研究角度、资料利用等因素的影响，对于近代在烟传教士的教育活动并未进行系统地研究。因此在全面了解烟台近代教会学校的基础上，抽丝剥茧，归纳各不同历史时期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是完全有必要的，对于近代烟台传教士活动的研究必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本文尝试从地方史出发，专门针对烟台传教士的教育行为进行研究。在深入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全面动态地考察了近代烟台教会学校产生和发展及其对近代烟台社会的影响，凸现了历史发展的变的特征，弥补了关于地方传教士教育行为研究的不足。在具体研究中探讨传教士在烟台所创办的各类教会学校，及其对民众生活、观念、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并特别考察了近代烟台教育观念的变迁，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从而揭示教会教育的一些独特层面。

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于区域分析，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对传教士在近代烟台的教育活动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试图从整体上做出客观的评价，总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教会学校的发展状态和特点。重新审视一系列教育活动背后的动机，以期突破教会教育史研究中的传统判断尺度，阐述其影响及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借鉴作用，更加客观地评价来烟传教士的教育活动。

本文还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根据传播学的相关规律去说明近代烟台教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从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及双方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出发，力图用传播学理论去论证近代烟台教会教育在主客观方面的不同出发点及效果，以期更加透彻地总结教会教育发展的积极性与局限性。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除利用档案、地方文史资料、相关著作及论文资料外，还特地对现存各教育机构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比如烟台毓璜顶护士学校的资料大多被存放在毓璜顶医院的图书馆中，笔者在烟台宗教局及烟台二

^① 《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② 山东师范大学2007.04。

中的校园建筑及相关学校所存史料中找到了有价值的资料等。此外，烟台基督教堂的牧师提供了来华传教士郭显德的传记。正是这些资料的应用，才使笔者可以较全面地阐述近代烟台教会教育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本文共分六部分，根据对 1861—1949 年间不同历史时期的教会学校情况的分析，分为烟台近代教会教育的发端及早期发展、完善、改革、衰落及结束五部分，探析烟台教会教育在各阶段的状况及特点，在文章小结部分，笔者通过对比，简述了教会教育对烟台近代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此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及本人学识有限，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挖掘资料也较为有限，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第一章 烟台开埠与传教士的进入

“近代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兴盛根源于殖民主义。”^①16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及对原始积累的渴求，西方殖民者开始大肆在全球抢占殖民地，而“基督教成为殖民主义手中扩张的工具，神圣的十字架染上一层厚厚的殖民主义毒素。”^②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来到中国。

一、烟台开埠

烟台古称“芝罘”，夏商时期属莱夷。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禹贡》记载曰：“莱夷作牧”^③，可见此地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临芝罘岛，以记功扬威。为防止倭寇侵扰，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89年），为海防在此设城屯军，名“奇山千户所”，并于所北濒海之山设狼烟台墩台，一旦发现敌情，则燃狼烟报警，人称“狼烟台”，简称“烟台”，烟台之名从此代替芝罘之称。^④史书上最早记载“烟台”二字是在清朝康熙12年（公元1673年）福山知县罗博所修的《福山县志》“地舆图”中。

开埠前，烟台面积很小，“周围不过数里”^⑤。及“法军七千人于1860年进驻烟台待命攻入天津时，烟台仅有一个小石城（奇山区千户所），数处渔村（海阳三村，通神村），几座山庄（上乔，金沟寨），和沿河（西南河）的稀疏人家。”^⑥

鸦片战争之前，烟台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大约有商户千余家，商家往来众多，贸易较为繁荣。烟台海运发达，有来自广州、宁波、锦州、关里等籍船帮常年进出，内外交通便利。此外，烟台还是中国北部较为重要的粮食、鱼类、盐等土特产品集散的商业城镇。

鸦片战争后，山东地区成为“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扩张的战略要地，也是西方基督教会开展宗教活动、发展教会势力的重点区域”。^⑦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极力主张：“让长老会攻打山东这个省份。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的

^①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③ 高潮：《解放前的烟台历史概述》，《烟台文史资料》第1辑，烟台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2年，第2页。

^④ 高潮：《解放前的烟台历史概述》，《烟台文史资料》第1辑，烟台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2年，第2页。

^⑤ 中国年鉴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丁），宗青图书公司1932年版，第5页。

^⑥ 曲拯民：《烟台教育发展史话》（1865—1945）（非卖品），烟台图书馆藏书，第1页。

^⑦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宗教与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在将来的年月里,它要把基督教献给中国。”^①而烟台作为当时山东半岛北岸、青岛开埠之前的最大商埠,再加上登州是清政府的军事重地,此地自然成为列强开埠首选之地。

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四千人登陆烟台,抢掠财物,截劫民船,伙同占据大连的英军封锁海面,截断南北海运。1858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即在牛庄、登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通商”。1861年,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考察”登州之后,认为:“登州府作为一个港口是不利的,它的港口浅,并且非常无遮蔽”。^②而论及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优越性,烟台港则远远好于登州港口。因此,经清政府通报下旨,烟台被作为第二批沿海通商口岸开放。

美国南浸信会的传教士高第佩(T. P. Crawford)夫人在《登州最初三十年差会史》手稿中提到“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内中规定中国新开数口对外贸易口岸”,很快美国“南浸信会本部即任命花雅各牧师和花雅各夫人为赴山东传教士”,但考察之后“考虑登州可能没有对外贸易,他们认为有必要在烟台建立一个差会或某种机构,通过这一机构代理登州差会。”^③由此也反映了烟台港的优势。

开埠之后,英国即霸占了半个烟台山建立起领事馆,日、德、俄、法、意、挪威、奥匈、荷兰、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瑞典、芬兰、朝鲜等十五个国家,相继建馆于烟台山及东之海滨,形成所谓的领事路。他们不仅管理着其在烟的商务贸易、宗教、文化、侨务、护照、房屋、地产,还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干涉着烟台当局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事宜。

由于,烟台的种种便利条件,大批传教士来烟传教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开埠后的烟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便利码头,为传教士们来烟活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传教士进入

1、国际背景——福音奋兴运动

18世纪,面对基督势力的逐渐衰落,英国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宣称要一生“尽最大的努力去宣传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福音,“并借助上帝的恩惠在人们的心中萌发”^④,从而发起了旨在复兴基督教的“福音奋兴运动”。

^①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期,第2页。

^② 王旋主编:《烟台历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③ 【英】法思远主编:《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郭大松译,上海广学会1912年版,第149页。

^④ 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792年,近代新教传教运动的先驱威廉·凯里建立了英国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浸礼宗广传福音会(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s)。在凯里的影响下,公理会联合长老会于1795年组织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并于1807年派马礼逊来华,为新教来华布道之先驱。^①英国成为新教大规模传教的起源地。而美国,宗教主义者则诡称:“美国基督教及其民主机构和制度的扩展,将把世界带进一个完美的千年王国,美国是上帝复兴世界的代理者。”^②在这一理论的号召下,新教各教派在内战结束后不久,如雨后春笋般组建起不少海外差会,活跃于亚洲、非洲等地。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受派来华,揭开了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

19世纪70年代,英美基督教流行的千禧年思想使得传教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后,“宗教复兴运动又一次在美国兴起”。^③比如,在烟著名传教士郭显德,便是因为宗教复兴运动的推动,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道的。“有另一种力量,逐渐引导他(郭显德)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事奉。这是在他就读杰佛逊学院的第二年,有一项运动使他更加确认自己的决定,即是1857年影响到学校和加能斯堡(Cannonsburg)镇的美国大复兴。”^④1888年7月,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成立,标志着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正式发端,从而掀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

2、国内背景

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在这些条约里,由于传教士的参与策划,全部塞进了容许在中国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⑤如中美《天津条约》规定:“耶稣基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⑥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对于各国在天津条约中所获传教的权利,除再予肯定外,并予以进一步的扩充”,^⑦又规定了传教士可以到内地活动的条款。晚清政府对基督教采取的宽容政策也必然推动了传教士来华浪潮。

1858年,《天津条约》将登州辟为通商口岸(后改为烟台)。1859年5月,美国南浸信会本部即任命花雅各夫妇(Mr. and Mrs. Holnus)赴烟台传教,同

^①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②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③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④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4页。

^⑤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⑥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5页。

^⑦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期赴烟台传教的还有英国浸信会。^①此后，西方新教各差会纷纷涌入山东。1861年美国长老会倪维思（J. L. Nevius）夫妇来到山东，与梅理士等人在登州建立了长老会第一个牧区。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民众在心理及生活方式上都与西方不同，而且传教是和中国战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教遭到了当地士绅、民众的强烈反对。尽管传教士们努力“对大批听众布道，但结果就像把种子撒入水中”。^②这些困难促使传教士们积极改变策略，开始利用教育手段，利用民众朴素的心理，兴办学校，“通过教育培养出掌握真正西方科学精华的”中国基督教徒。^③

3、烟台教会势力的发展

十九世纪下半叶，烟台是山东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一直是山东海上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传教士大部分经由海路到达山东，而登州是必经之地。再加上烟台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因此吸引了大批传教士纷纷来烟。烟台自1861年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各国纷纷设立驻烟台领事，外籍人口不断增加，1891年烟台的外国侨民达370多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居留烟台的外国人增至1160人。^④

据载，“烟台之有耶稣教，始于清同治元年，有长老会教士麦加缔至烟台传教。同治三年又有郭显德教士至烟台传教。”^⑤而据烟台民族宗教局研究整理，首先来烟台传教的是1851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实腊。烟台开埠后，1859年5月，以美国南浸信会（the Southern Baptist Board）传教士花雅各夫妇（Mr. and Mrs. Holnus）登陆烟台为起点，天主教、基督教纷纷派人到烟台传教。海雅西（Hartwell）、倪维思（Nevius）、郭显德（Corbett）和韦廉臣（Williamson）等人，是早期来烟台传教士的代表。随着传教人数的增多，他们遍布烟台城市、乡村乃至山区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⑥。与南浸信会差不多同时到达烟台传教的还有英国浸信会。^⑦

最早在烟台传教的当属美国北长老会。1861年，倪维思（J. L. Nevius）牧师携夫人从宁波来到山东，他们和梅理士等人在登州建立了长老会第一个牧区。1862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麦嘉蒂来到烟台，在烟台设立最早的传教区。^⑧

据1914年的相关报告，从1861年到1914年，烟台有教会4处，乡区教站

^① 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0页。

^②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天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③ 朱冬梅：《西方基督教与近代山东女子教育》，《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6页。

^④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外事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⑤ 郑千里：《烟台要览》，胶东新报社1924年版，第23页。

^⑥ 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⑦ 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0页。

^⑧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30-232页。

42处，教友2000余人。主要差会有长老会、浸礼会、浸信会、内地会、苏格兰兄弟会等等。其中基督教长老会传入最早，势力最强，影响最大。据长老会1913年报告称：从1862年到1913年间，美国北长老会差会派遣来烟传教士“已有牧师、太太、小姐、大夫四十八人之多”，并称“山东教会胚胎于登州，萌芽于烟台”。^①从山东长老会召开会议的地点看：自1865年11月到1936年11月的71年间，山东长老会共召开大会25次，在烟台11次，登州7次。从山东各地长老会成立的年代来看，济南（1871年）比烟台晚5年，青岛（1898年）晚烟台32年。^②其中，北长老会在烟代表人物是1863年7月来华的传教士郭显德夫妇和狄考文夫妇等。1867年，北长老会在毓璜顶北坡建造基督教礼拜堂，占地4662平方米，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胶东的一个重要的传教中心。基督礼拜堂的建立，也相应扩大了北长老会在烟台民众中的影响力，推动了传教士们传教工作的顺利开展。

1868年，天主教意籍神甫昂智鲁斯在烟台建立教堂。1894年法籍神甫常明德来烟建起烟台教区，首任主教，总辖登莱青三府三十余县的传教活动。1924年统计，教区有教徒25000余，烟台教徒300余。烟台天主教堂附设施医病院（又称天主堂医院，俗称法国医院）、麻风病院、公教进行会、白衣修女会及男女学校四处。^③

伴随着各大新教差会的进入，烟台逐渐成为近代传教士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各差会在传道的过程中，通过兴建新式医院和教会学校等活动，对于烟台教育也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① 侯孝坤：《烟台基督教长老会与郭显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芝罘文史资料》第4辑，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版，第200—203页。

^② 侯孝坤：《烟台基督教长老会与郭显德》，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芝罘文史资料》第4辑，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版，第200—203页。

^③ 【英】阿美德（A.G.Ahmed）：《图说烟台（1935-1936）》，陈海涛、刘惠琴译，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60-163页。

第二章 教会教育的发端及早期发展

为了布道的需要，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尝试创办教会学校，以“培养能够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①传教士倪维思也曾明确提到：“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他们只花费差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劳力与时间约四分之一，却为该地教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②传教士们逐渐明白，必须改变传教手段，用科学文化引起中国社会的注意，才能真正推动传道事业的开展。

一、烟台教会教育的创立

1862年烟台开埠，传教士们开始通过设教堂、赈灾、建医院和办学校来扩大影响。其中，尤以创办学校最引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他们企图以此来培养本土传教士，给“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其能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③

据《烟台概览》记载：“首先到烟台传基督教者韦廉臣博士夫妇。在1855年6月24日系美国苏格兰长老会，设教会于通伸村布道。设男女学校、医院，颇有绩客观”。^④

在烟台办学的外国教会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其中以基督教所办教会学校影响较大。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认为：“传道者当先设立学校”，^⑤对烟台近代学校的影响较为显著。他们在烟台地区的传教士有79人，其中拥有博士或者名誉博士学位的17人，分别有神学、医学、哲学、法学等博士。^⑥1866年，北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博士夫妇在烟台率先创办了文先小学（男校）、会英小学（女校）。1896年，两校合并扩充为会文学校。郭显德在中国的传教及文化活动长达半个世纪，在烟台境内就有10余所学校由其创办。此外，为了适应教会和洋行的发展需要，1897年韦丰年（George Cornwell）创办了英文馆，后改为实益学馆。1898年，传教士梅理士的妻子阿耐德·汤姆森（Mrs. Annctta T. M.）将启暗学校由登州迁至烟台，成为中国最早的启暗学校。

^①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② 顾长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③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4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④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版，第71-72页。

^⑤ 滕松梅：《基督教会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第131页。

^⑥ 连敬斋著：《郭显德牧师行传》，上海广学会1940年版，第20-56页。

其他如基督教南浸信会、天主教会、内地会、英国西差会等组织，也纷纷改变传教方式，走上了办学校以辅传道的道路。

二、发展状况

烟台辟为商埠之初，只有私塾。西方传教士来烟后，开始兴办新式学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烟台近代教育的发展。

1、登州文会馆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博士（C. W. Mateer, 1836. 1. 9-1908. 9. 4），携夫人狄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于1864年1月中旬抵达登州。^①鉴于传教的艰难，狄考文开始尝试办学活动，“招集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结之以恩义，及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②

他们买下一间久已荒芜的观音堂（今蓬莱城石岛福乐堂），开办起住宿的“蒙养学堂”。1864年秋天蒙养学堂开学，学校免收学费，然而当地人对此十分冷淡，首批只招收6名“寒素不能读书”^③的儿童，学制为六年，相当于之后的小学，狄考文也因此成为在烟台最早开办教会学校的先驱者之一。蒙养学堂发展到1866年时，学生数量增加到了11人。自1864年至1872年的九年中，蒙养学堂五次更换教习，共招学生85名，但学成者少。据《文会馆志》记载，学满6年者仅有4人，其中用于教会者1人，肄业者22人，其余皆半途而废。^④

1876年，文会馆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学制12年），共李山青、邹立文、李秉义等三人。同年，由于学校的声誉日盛，“学生之程度渐高，其品德日进，来学者日益多。狄公……毅然议添高等科”。^⑤学校名称改为“文会学馆”，“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⑥学校设“正斋”和“备斋”，在课程设置方面开始逐步添加大学课程内容。正斋六年，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历史、理化、理财、天文诸科；备斋三年，分道学经学、国文、算术、地理、乐法诸科。其中“乐法”课是狄考文夫人狄就烈于1872年编写《乐法启蒙》后开设的音乐课。

1882年，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批准了狄考文扩建文会馆为大学的要求，定名为“登州学院”（Tangchow College），中文仍称文会馆，成为我国第一所教会大学。此时学校共五位外国教师，其中三位女性（狄考文夫人、赫士夫人与丽莲小姐）。1886年，文会馆重新择地“建西式楼一座。一切讲堂课室、物理仪器、动植标

^① 曲拯民：《中国最早的一间大学》，美国《亚省时报》，2002年2月15日。

^②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淮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印，第4页。

^③ 蔡玉琢：《登州文会馆》，《春秋》2003年第3期。

^④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淮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印，第31页。

^⑤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淮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印，第26页。

^⑥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版，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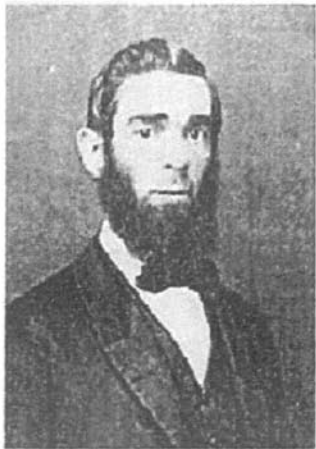
本,悉列其中。惟藏书室、阅报所、电机房、沐浴室、化学实验处及观星台另建于重楼之后。同时亦改建斋室十数间,并旧存者足容百余人。此外,尚有西洋教员住宅一所,建于学堂东北院。博物陈列所建于学堂之前”^①。1889年,文会馆注册学生达100人。19世纪80年代的文会馆已经是一所各种设施和设备较为齐全的正规大学的规格。

狄考文为文会馆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备的各种试验设备,先后独自或督促他人编译了各级各类现代学校教科书近30种。他主持编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被海内外认为是最具规模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

狄考文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他却是海内外公认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由于狄考文处事严谨果断,对学校学生要求尤为严格,当时有“狄老虎”的称号。^②

2、会文学校

1863年7月,传教士郭显德夫妇来到烟台。郭显德夫妇先在在登州苦读中文,住了八个月,又搬到烟台近郊的珠玑村,住在一幢老百姓传说闹妖的房屋里。长老会认为:“这是从仇视我们的人民手中,唯一能租到的据点。”^③



28 歲時的郭顯德
攝於1863年赴行前

根据基督教北长老会“传道者当先设立学校”、“传不如教”的指导思想,^④郭显德于1864年在烟台通伸河村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开办学校,宣布学费全免,

^①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版,第12页。

^②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40页。

^③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版,第181页。

^④ 范约翰:《上海清心中学滥觞记》,《清心两级学校70周年纪念册》,1910年版,第21页。

招收到三名小学生。但是邻居们和地痞却威胁小学生和当地的中国老师，扬言要杀掉他们，两个小学生吓得不敢再来，老师在缺课两天后捎话过来，说他还没有勇气做一名殉道者。学校的前景似乎不乐观，但郭显德却继续坚持下去。

后来，在父亲和纽约的布莱克教会（Brick Church of New York）的支持下，郭显德在烟台毓璜顶山下，购买了庙方的地产，建住宅、招待所、学校及礼拜堂。1866年4月，郭显德夫人的朋友即同事杜宇宁（Miss C. B. Downing）女士也来到烟台加入教学工作。1866年12月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先后成立，学制六年。初期，学校规模很小，女子小学只有六个学生，由杜宇宁小姐主持。^①



1908年長老會所屬各學校師生暨教會全體歡迎郭顯德夫婦自美國歸來
(左方上角為郭顯德故居)

自1871年起，郭显德逐渐打开了传教的局面。美国北长老会的倪维斯牧师（Rev. John Livingston Nevius，自1861年6月来到登州，与甘雷、丹弗司在登州建立第一个长老会总堂）夫妇于1871年到烟台，协助郭显德在毓璜顶南建造“南楼”，并在会文学校教书，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培训中国门徒的工作，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每年冬季他们把要求信教的人招集到烟台受训，鼓励其中有希望的人继续学习，练习传教，并从中挑选一些加以培养，准备提拔为牧师、宣讲师、教员，在中心区或内地布道所中工作。郭显德还把他们的子女，吸收到文先或会英小学学习。学生逐渐增多后，学校只收教徒子弟，课程以圣经为主，辅之以“四书”、数学、格致、史地、化学、英语，培养为教会服务的信徒。

1885年到1886年间，郭显德回国休假，得到堪萨斯州（Kamsas）的威奇塔

^①【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09页。

市(Wichita)第一长老会2500美元的捐款。郭显德增办了中学班,建立了高一级的“文先”、“会英”书院,两校经常合班上课。1896年,鉴于两校的发展需要,郭显德将其合并扩充为“会文学校”,直译其英文名即“郭显德中学”,由刚来不久的美籍传教士埃特累迟任校长。1888年,来华参观的托马斯·马歇尔(Dr. Thos. Marshall)博士捐资兴建了教学楼,并给学生上圣经课程,教学楼因此被命名为“马歇尔楼”。

郭显德为传教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烟历五十余年,开创学校数处,博物院一处,为长老会中之伟人。”^①后人称其:“作盐作光济世济人,设教兴学成绩昭著”^②。

3、韦丰年与英文馆

英文馆是美国在烟台兴办的第一所商务学校。韦丰年,纽约州人,安慕赫士大学纽约联合神学院毕业。1894年韦丰年携夫人抵达烟台,主要帮助郭显德办理教务。当时的烟台,埠口洋行和洋人兴办的工厂逐渐增多,但是当地人士精通英语者甚少,海关、邮电、洋行、航务、使馆雇员都是外省人。一些绅商和教徒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到洋行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办一所高级商务学校。当时的教徒李伯轩、李载之、王幼达、孙绍襄、梁浩池、万霞如、李琴轩等人,同意每人每年捐银2000两,为期10年,要求长老会再办一所学校,负责建设、管理、供给义务教育,在以上条件下10年后全部财产可由学校承接。^③此外,美籍女教师杜宁(C. B. Downing)也鉴于会文学校已不能满足教徒子女上学的要求,亦愿捐助3000元(墨币)。^④于是,1897年,韦丰年在募款充足的情况下于毓璜顶西南坡购买土地和房屋,开办学校。随后,长老会委派白尔根博士为第一任校长,韦丰年辅佐之,取名“Temple Hill English School”,通称“英文馆”。^⑤

在英文馆中,韦丰年自编讲义,请传教士夫人们担任教习,并向美国同道积极呼吁以求支持。学校主要招收小学以上程度的学生,学习内容以英文为主,辅以圣经、“四书”、物理等,专门培养洋行买办、海关、邮电等职员。

4、启暗教育——烟台启暗学校

安尼塔·汤浦生(Annette E. Thompson)或称梅耐德,纽约人,是美国传教士梅理士(Rev. Charles Rogers Mills)牧师的第二任妻子。她先后参与了登州启暗学馆和烟台启暗学馆的创办与主持,为中国的启暗事业作出了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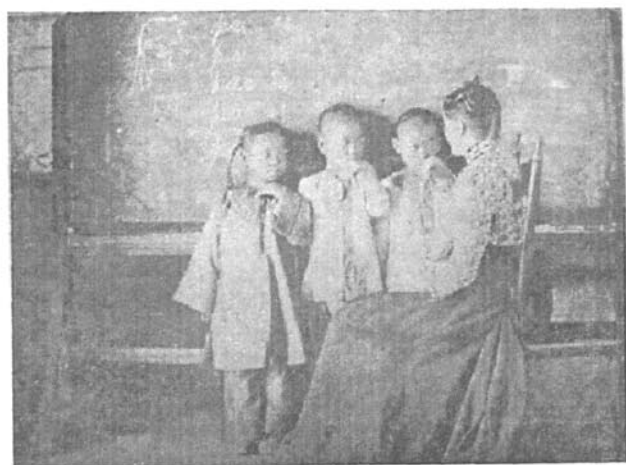
^① 郑千里:《烟台要览》,胶东新报社1924年版,第26页。

^② 史直:《郭显德博士传奇》,《翼报》第11期,2005年6月。

^③ 曲拯民:《烟台益文商专》,《烟台文史资料》第12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35页。

^④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烟台市文史资料》第1辑,烟台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印,第183页。

^⑤ 曲拯民:《烟台益文商专》,《烟台文史资料》第12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36页。



上圖為 1903 年博濟學校老師教學生「P」的發音



梅理士夫人湯浦生女士

1864年初,梅理士夫妇与美南浸信会的海雅西夫妇、高第配夫妇及洪米士夫妇共同欢迎狄考文夫妇和郭显德夫妇抵达登州。1882年,梅理士回国休假时,结识了纽约罗杰斯特(Rochester)聋哑学校的老师安尼塔·汤浦生小姐,并于1884年在烟台结婚。

1887年,梅理士及夫人汤浦生共同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专门教育和训练聋哑儿童的学校——登州启喑学馆,由梅理士任馆长,汤浦生任教员,聘请一名懂英语的当地人李元恺担任助教,办学经费由梅理士所属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供给。登州启喑学馆规模小,尽管采取了一些吸引学生的措施,如“衣食全由校方供给”等,但因得不到当地政府、舆论的支持及民众对基督教会的不信任,入学的聋哑儿童“寥寥无几”^①。在办学的十年中,只招收4名学生。^②

1895年梅理士病故,长老会停止经费供给,学馆被迫停办。汤浦生子然一身,一面继续在乡间布道,一面积极联系欧美各国友人,请求帮助学馆复校。1897年,她收到罗彻斯特聋哑学校的回信,表示愿帮试办一年,但要汤浦生必须放下传教工作,将全部精力致力于聋哑教育。汤浦生毅然应允,于1898年5月将登州启喑学馆迁来烟台,在烟台通伸村租借两间平房,招生7名,重建烟台启喑学馆,聘中国人李可受为助手。

启喑学馆开办初期,只设男生部,招生对象仅限于聋哑男童,入学者的衣食全部由学校供给。经费来源,除长老会补助外,多由募集而来。

5、实业教育——花边学校

1888年,美国北长老会牧师海尔济(Rev. George Hays)及夫人郭芬妮(Fanny Culbertson Corbett)抵达登州,先在登州文会女校教书,同时教女生及乡村妇女织花边。海尔济夫妇可算是在烟台创办花边学校,并将西洋花边编织技巧和样式传入中国,试图使之产业化的第一人。但后来由于受到其他教友的排斥,认为他协助外贸与传教士身份不符,“传道应以救人灵魂为主,不应以救人身(生计)为重”^③,因此1894年,海尔济夫妇返美,花边学校停办。



马茂兰夫妇

^① 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烟台文史资料》第1辑,烟台市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2年,第198页。

^② 曲拯民:《中国全国最早的聋哑学校》,《翼报》第36期,2007年7月。

^③ [美] 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45页。

1893年, 英籍传教士马茂兰夫妇来到烟台, 见到穷人众多, 深感同情, 认为“进行实际的工作和传道相辅并行才是上主的真正旨意”^①, 其母会内地会对此倡议却不予考虑。于是马茂兰夫妇建立了烟台工艺会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又称奇山会。

在传教过程中, 马茂兰夫妇发现烟台妇女个个心灵手巧, 会绣花, 会剪纸, 鱼网也织得非常漂亮。但是, 由于严格的封建礼教限制, 许多妇女只能待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 生活十分清贫。于是马茂兰夫妇就产生了利用传教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 向她们传授一门谋生手艺的想法。1896年, 马茂兰夫人接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海尔济夫妇所办的女子花边班, 创办了花边学校 (Chefoo Industrial School), 成为烟台最成功、最典型的职业教育。学校宗旨是: “(1) 引领学校信奉基督, 塑造学生合乎基督的品格。(2) 使学生接收良好的教育, 以便可以颂读《圣经》, 成为社会有用之材。(3) 教授学生编织花边, 可以在日后需要维持生计。”^②

花边学校的招生对象为贫寒人家的女孩, 后来从收容所营救的身世凄惨、无家可归的女孩也来到花边女子学校学习。起初, 即使是贫寒人家也很少送女儿入教士开办的花边学校, 但经过马茂兰夫人多年耐心和努力, 加上人们看到编织花边的确可以给家庭带来实惠, 送女孩入学的家庭开始增多。

总之, 在众多基督教传教士所从事的工作中, 马茂兰夫人的花边学校, 无论从成绩还是影响上, 都是令人瞩目的, 花边工艺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

6、其他教育事业

登州女子学堂

最早在登州办学的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夫妇。1862年, 倪维斯夫妇在登州开办了一所女童寄宿学校, 又称登州女子学堂, 后改为文会女校, 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 开登州和山东女子教育之先河。在女子学堂中, 倪维斯夫人号召反对旧的封建习俗, 主张“天足”,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民众素质。^③但是, 清末民初, 先进人士发动的晚清维新运动曾提倡放足, 清末新政时期, 政府提倡废除缠足陋习, 辛亥革命也大力宣扬禁绝缠足, 但都未能成功。由此可见, 早在19世纪中期, 传教士提倡放足必定会受到很大的阻力, 但也会给民众的思想解放带来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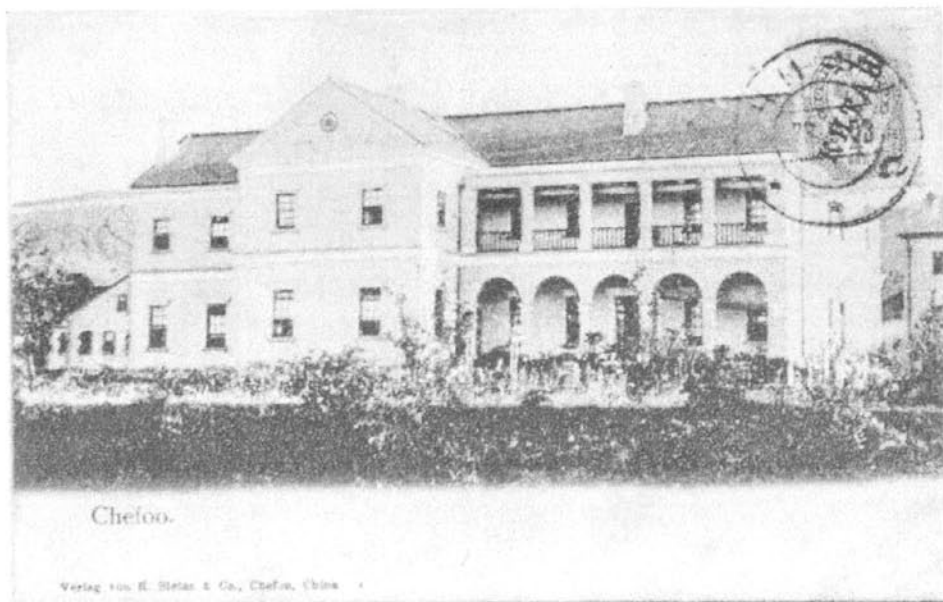
^①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 1860—1916年》(下), 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82年版, 第470页

^② [英] James and L. McMullan, *The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No. 277.

^③ 【美】魁格海 (James R. E. Craighead) 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 小光译, 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第233页。

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s)

芝罘学校又叫做中国内地会子女学校,是中国内地会在山东烟台创办的著名的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包括三所分别为男女青少年和幼儿设立的学校。



内地会小学女校



内地会学校现景

自 1866 年以来,中国内地会的男女传教士大多在内地省份的穷乡僻壤传播福音,为了解决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1879 年,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来到北方海滨城市烟台,在东郊风景优美的海边买地(今滨海路海军航空学院内)设疗养院。1880 年,出身于学校教育者的埃利斯頓(Elliston)先生开始为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捷德(Judd)先生的孩子们(Fred, Ross 和 Edwin Judd),教授一些课程。此时,其他一些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希望埃利斯頓能够同时教授他们的孩子,两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一所混合年级的全日制学校,规模逐渐扩大。1883

年，学校盖起了一座教学楼，男女学生住宿。1885年，男生、女生开始独立设校授课，从此开始，学校的组织机构逐渐完善。1895年，在毓璜顶以西约1英里的通伸村，正式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十岁以下男女儿童的预备学校。^①同年，麦卡锡(McCarthy)先生被任命为中国内地会子女学校男校校长，由于他的努力，中国内地会子女学校影响逐渐扩大。

中国内地会子女学校，其最主要目的是吸收中国的苏格兰内地会传教士子女入学，并不接受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子女入学，所以对烟台本土的社会及教育等影响不大。

此外，郭显德等人在烟台建立了烟台长老教会(总站)的圣经训练学校，作为培养合格传教士的基地。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郭显德都要举行大范围的密集巡回传道。

三、发展特点

1、办学难度大

中国人是信仰多神的民族，烟台在近代与其他地区一样，各种新旧宗教并行。比如，在莱阳地区，耶稣教于1882年由美国人传入(长老会)，1901年德国人传入(信义会)，1905年浸信会也传入，清末民初教徒甚多。^②但新教传入初期，中国民众是极为排斥的。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再加上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人对任何外国势力都抱有特别的警惕。传教士来到烟台，其传教活动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和接受。他们把传教士们称作“洋鬼子”，在宁海(即今天的牟平)还流传着一首诗：“谁想把自己毁掉，去给洋鬼子抬轿”，^③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愤恨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初期的传教士如狄考文办理蒙养学堂、郭显德办理会文学院等办学活动，可谓困难重重。

土地问题方面，无论是租赁或购买，传教士都很难获得土地。“1866年，狄考文因租房问题与登州地区的居民发生冲突，当地出现砸碎传教士墓碑、辱骂恐吓乃至殴打传教士的事件。”^④郭显德也同样遭遇此类苦难，1864年9月24日，郭显德报告领事说：他自1864年1月15日到1864年8月22日都没法购置或租赁房屋。而后期的梅理士则相对较为幸运，但在其租到房子并要装修的时候，工人们却收到警告不得为外国人干活，梅理士因此只得自己动手带着佣人进行整修

^①【英】阿美德(A. G. Ahmed):《图说烟台(1935-1936)》，陈海涛、刘惠琴译，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68页。

^②万邦维、卫元爵修：《莱阳县志》第3卷，清康熙17年(1678)版，第54-58页。

^③【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④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天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活动。^①

初期的传教士没有得到各差会的全力支持，缺少经费。如 1895 年梅理士去世后，其所在的长老会停止对于登州启喑学馆的经费供给，致使学馆被迫停办。后期，在梅耐德的大力呼吁下，才有美国的罗彻斯特聋哑学校愿意提供经费，帮办学校。

2、招生政策及招生情况

在招生方面，当时各教会建校的政策是：无论哪里，只要基督徒到达一定的数量并稳定的支持孩子去上学，就在那里设立学校，有潜能的孩子经过训练后，再送到烟台长老会接受进阶的教育和培训。鉴于此，初期的各教会学校绞尽脑汁，采取优惠政策以吸引学生入学，但效果并不理想。

1864 年 9 月 25 日，狄考文创办的蒙养学堂正式开学。对于学生，“凡入校学习者除免其修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鞋帽，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及其归家路费等皆出自学校”。^②然而，老百姓对此的反映大多是冷淡、恐惧或者疑虑。故首批学生寥寥无几，只招收“素寒不能读书”的儿童六名，除一人之外其余都不识字。一年以后，六名学生中有两名学生被家人带回了家，一名由于过于呆滞被劝退。三名新生被招收进来，总数仍为六名，但没有一人皈依基督教。据统计，在 1864—1874 十年间，学校共有 91 名学生，其中 22 人转学手艺，剩下的学生也使教师头痛，17 人跟不上学业而退学，11 人因无法管教而被开除，还有 11 人自己逃跑了，最后学满 6 年者仅 4 人。^③

1862 年 10 月，郭显德在通伸河附近创办学校，宣布学费全免，但最后只招到两名儿童。后来由于有关教会对学生挖心抠眼的谣言盛行，无人敢送子弟入学，连两名儿童也逃跑了。此外，郭显德曾在 1866 年 3 月 16 日的日记里写到：“四个学生离开了学校，因为有人骚扰、欺骗学生，说他们会被拐卖到外国去。现在只剩三个学生。还有几个学生要求来上学，但我不想收，除非他们能够提出书面保证，持续上学而不辍学。”^④为了摆脱聚集在学校周围的无赖们的骚扰，郭显德只得将学校搬到了毓璜顶的新居。为了增收学生，文会学校还招收了一些旧式知识分子，“招收乡区不第生员，荟萃一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年毕业，或可传道，或充师资。”^⑤

这一时期教会女校招生尤其困难，由于中国没有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传统，走出家庭本来就非常困难。加上中西长期隔绝，一般民众对传教士有疑惧和猜忌。

^① 张力、刘鉴堂：《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72 页。

^② 王元德、刘玉峰编：《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淮县广文学校印刷所 1913 年版，第 3 页。

^③ 王元德、刘玉峰编：《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淮县广文学校印刷所 1913 年印，第 9 页。

^④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106 页。

^⑤ 连敬斋：《郭显德牧师行传》，上海广学会 1940 年出版，第 124 页。

教会女校挖眼制药之类的传说在当地非常盛行，家长们都不愿将孩子送入教会学校。因此，为了吸引学生入学，花边学校（女校）等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发给衣物和少量零钱。不过“虽备加优待，而学生仍寥寥无几”。有限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社会底层，“不过为使婢弃女及最穷苦者之女孩，以校中有衣食供给，故甘冒与洋人接近之危险”^①

3、学校为初级班水平，传教士兼任学校教师

20 世纪之前，由于来烟传教士数量尚少，且水平参差不齐，所创办的各类烟台教会学校在办学条件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由于资金的不足，再加上烟台民众文化普及的缺乏，初期的教会学校大多只是停留在教学生识字的初级班水平，并未达到专业化及正规化标准。

此外，初期的各教会学校，教师大多由担任传教士兼职，他们在烟台地区传教的同时兼任教师教授文化。比如狄考文夫人兼职音乐教师，并编写音乐教材《乐法启蒙》；其他传教士如赫士、柏尔根等传教士担任文会馆教师；韦丰年创办英文馆后，自编讲义，并请传教士夫人们担任教职；倪维斯夫人自办登州女子学堂，并自任教员；郭显德牧师创建文会学校后，除亲自授课外，还邀请女儿女婿来华，其中女婿海尔济 1890 年来到烟台协助郭显德治理教会，并在文会学校教授学生体操，锻炼身体，女儿郭芬妮亦担任学校教员等等。

一般来说，在教会学校兼职的各传教士除了在校授课，还要花费大量时间深入乡间传教。比如郭显德在建立会文学校后，仍然坚持深入内陆进行传教工作。他曾经在一次个人报告中提到，他曾在一年中用了四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内陆传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走遍了五个人口稠密的县辖区”，“在这次外出旅行中，我们共计传道给 602 个城镇和村庄”，“九月份我又开始了另一次传道旅程，第一个月我们就到了 215 个地方传道，其中大部分是我们春天的巡回中没有到过的地方……之后我又作了一次四十天的巡回布道，得到绝好的时机去帮助他们播撒福音的种子……”^②

4、教学内容中国化

关于教会学校的教学目的及教学内容，狄考文曾在 1877 年的“基督教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作了《基督教与教育》^③的长篇发言。他认为基督教与教育之间有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教会“不能把教育这项伟大的工作留给世俗社会去办”。狄考文认为，传教士举办的学校必须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因为，“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他批评了仅为发展教徒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7 页。

^②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109 页。

^③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见朱有献、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史史料》第 4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4—94 页。

或培养“福音布道者”的办学目的。认为持此观点会导致教会学校“大部分都是初级学校，而教学又多只限于教义课本”。他说，尽管这一观点相当流行，但却是肤浅的，教会学校对基督教的发展要起“间接”的推动作用，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智力的、道德的与宗教的教育，不仅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帝后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捍卫和促进真理事业的有效力量。”

当然，传教士最初开办学校时，毫无选择地只能使用中国传统教材，聘用中国人作为教员，很少有传教士拥有足够的语言技巧用中文上课。后期，教会学校为了迎合宗教、中国儒学及现代自然科学的要求，在课程方面进行综合，成为“中国式私塾、西洋学校和神学院的‘三结合’”^①的大杂烩。

据史料记载，登州文会馆在课程方面，儒家典籍的学习一直占总课程的三分之一，几乎占用了学生学习时间的一半。狄考文看到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支柱，而山东更是儒家思想的摇篮，要在一直尊崇古圣先贤的山东社会立足，使学生能与封建士大夫接触而不被轻视，必须把儒家典籍列入教材并鼓励学生参加科举，以提高学校在社会上的地位。所以蒙养学堂在初期是很重视中国经书学习的。此外，文会馆在授课时主要“用汉语施教”，而不用英语教学。^②狄考文认为，用汉语教学可以使毕业生在中国士大夫中间取得学术声望，引导学生与民众交往并影响他们，而英语教育则会使毕业生“被通商口岸吸引去”，“不去拥护（基督教）真理而是反对真理”。^③1875年，文会馆学生邹立文还未毕业就参加了蓬莱乡试，名列前茅，更增强了狄考文重视汉语教学和中国经典教育的决心。^④在后来的十年中，学校又先后推举17名学生参加乡试，结果16人通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会馆中国传统文化及古代典籍的学习成果。但文会馆的宗教教育仍占主要部分，教学内容的中国化仍然是为其传播基督教服务的。

5、初步采用新式教学方法

早期教会学校基本上采用了一套近代教育方法，如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注重培养思维能力和采用实验方法等，有效推动了教育近代化进程。

采用实用主义教学方法。80年代时期，狄考文在文会馆专门建造了工作房和理化室。物理室有一些必要的设备仪器，化验室有各种药品、药水，供教学试验使用。袁世凯早年在登州当军官时，就曾参观过文会馆的实验室。启喑学校在办学中，“努力为这些孩子们做到三件事：即给他们一种用言语或文字同伙伴交流的方法；教给他们一些有用的手工艺或训练他们做一个看家的人；教给他们一些人生责任的观念和救世的知识。所有课程都尽可能贯彻这些宗旨。”^⑤学校还根

^①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教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③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④ 工神荫：《齐鲁大学校史简介》，《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⑤ 曹立前、郭大松：《传教士与烟台启喑学校》，《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73页。

据男女学生的不同特点,安排不同内容的工艺课。男生主要学习木工、农作、手工和机器编织、烹饪等,女生则主要学习缝纫、编织、刺绣、花边、烹饪等。学校还专门配备有教授工艺课的教师,并开设有专门花边班。

开始重视体育教育。会文书院初期特设体育课程,即为烟台现代体育之始。初时,许多烟台百姓认为学校开设体育课会误人子弟,因此有的家长勒令子女退学。但随着体育活动的普遍兴起和清政府新式学校的设立,民众逐渐接受现代体育教育模式。郭显德曾批评道:那些被认为“用功读书,即是好学生”的学生,结果身瘦面黄,腰背佝偻,小辫弯曲,颧骨尖削,而“赛跑运动必受重罚”,这都是教育制度的失误。为此,他特别指出体育符合卫生和生理要求,应当是“学校中紧要课程”,上体育课能使学生“发达其筋骨,舒散其血液,抖擞其精神”,“达其健康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其智育、体育、德育”。^①因此,郭显德很早就提出了对学生实行军训的教育方法。他说:“至于兵式体操(军训),更为示范生及训练员多必须学习之技术。盖兵式体操,不仅可以活动其筋骨,而与脑力尤有莫大帮助,且使有勇知方,团体合作,是大有益之事。”^②

总之,这一阶段传教士的办学活动并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虽然困难较多,但对于教会来说,在中国办学是恰逢其时。由于晚清时期尚没有近代教育机构,所以传教士们长时期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竞争和限制,逐步地建立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近代教育体系。

^① 连敬斋:《郭显德牧师行传》,上海广学会 1940 年版,第 457—495 页。

^② 连敬斋:《郭显德牧师行传》,上海广学会 1940 年版,第 178 页。

第三章 烟台教会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完善（1900—1921）

一、发展的原因

1、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政策变化

20 世纪初，清政府及山东政府方面都出现了有利于教会学校发展的政策和方针。1900 年，清政府宣布“嗣有外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①；1901 年 4 月，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朝廷，条陈“十大新政”，9 月，又奏《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章程折》，并立说立行，这些政策都给教会办学提供了便利条件。而清末新政的主要成果就在于确立了西方近代科学在学校教育的地位，尤其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初步确定了教育的现代化方向。在清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原先被中国人视为异己文化的新教学内容，现被确认为教学正宗。再加上清政府对留学的鼓励和嘉奖，使得教会学校因其外语与数理化学科的优长而成为社会热门。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内地被迫向教会全面开放，各差会认为这是扩大教会势力的极佳时机，应当立即着手教会大学的正规化建设，扩大招生。

在此情况下，辛亥革命前夕，山东地区的教会学校在学人数比义和团运动之前翻了一番。

2、教会自身政策调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教会学校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质量和水平都有长足的进展。教会学校纷纷兴起，并出现了最早一批教会大学。但随着山东近代教育系统的逐渐确立，国立学校实力开始增大，对教会学校形成了强烈的冲击。1919 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就在调查中意识到：“即使在目前，国立学校在中国教育生活中已经是个支配力量，中国教育的前途将越来越属于它们……随着时日的消逝，在中国整个教育程序之中，教会学校所占的比重将要相对地缩小。”^②二十年代，教会学校在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方面已经失去优势。在这种情况下，1921 年欧美各差会共同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对中国各地学校进行了广泛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指出“中学为教育系统之中坚，下级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4 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56 页。

学校教师之一大部分皆由中学供给之。在全体教育组织中,中学为最稳固最能自立之部分,而入基督教的专门学校之一大部分学生亦由斯出焉。”^①此外,在1922年上海全国基督教大会上,中学教育的重要性被再次强调。因此,教会在教会中学认识上的这一转向大大促进了二十年代教会学校的发展。

面对公立学校的蓬勃发展,为使教会学校对山东教育的发展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传教士们放弃了在办学数量上与公立学校的竞争,他们将主要力量放在发展中、高等教育和完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上。正如主持基督教在华发展情况大型调查的罗炳生所言:“教会应同时兴办大、中、小学校系统,其教育质量不应亚于国立学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会有好的领导人才,这是与教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②不可否认,20世纪初期,努力发展教会中高等教育,在办学质量上争取优势,已经成为多数热心教会学校教育事业的传教士的共识。至1920年,教会学校在办学质量上已逐渐显示了优势。

在此时期,传教士烟台地区设立了一些较正规的中学,而且还设立了专门学校,如益文商专、护士学校等。由此,继续扩大了教会教育在烟台的影响力。

二、发展状况

在20世纪初期,美国北长老会仍然领跑烟台教会学校活动。文会馆于1904年由登州迁至潍坊,后改名为齐鲁大学,校址迁往济南。自1864年到1904年文会馆迁往潍坊,文会馆毕业生共26届170名学生。^③狄考文可算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在全国基督教学校教育中颇具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其他如启喑学校、益文商业学校、花边学校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他新建立的学校有:白尔根夫人(Mrs. Paul Bergan)创办的爱道学校、郭显德夫人苏紫兰(Mrs. Hunter Corbett H. R.)创办的毓璜顶幼稚园、美籍传教士毕格尔夫人(Mrs. C. D. Beegle)创设的护士培训班等、南浸信会创办的卫灵女校等。

1、实益学馆——韦丰年

“英文馆”建校初期,北长老会委派白尔根(Paul. D. Bergen)担任校长。但他主持英文馆时间仅有一年,后调任青岛。因此,1900年后维持和发展英文馆的责任完全落在了韦丰年的肩上。韦丰年在建设英文馆之初以“智仁勇”为口号及目标创建了童子军,后来成为烟台市内各中小学群起仿效的榜样。

1905年,美国北长老会特派美国西北大学毕业的学士毕维廉担任英文馆校长。毕氏担任校长后,学校名称定位实益学馆,并“改善课程,提高程度,学校

^①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376—377页。

^② 王神萌:《解放前基督教在山东所办中小学概况》,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③ 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106页。

声誉日高”，学生益众。原有的校舍不敷应用，毕维廉于 1910 年回美国发起募捐活动，得到美国克礼夫兰城有基督徒史维兰（L. H. Severance）的慷慨帮助，独捐 5000 元（墨币）；再加上烟台绅商、教徒共募 5000 元。毕氏利用这笔募款为英文馆添设了一所可以容纳办公、会议、礼堂、图书馆、理化和普通教室的建筑。为了纪念开办“英文馆”的韦丰年，新建校舍定名为“思韦堂”。^①

实益学馆于 1920 年与会文学校合并为“私立烟台益文商业学校”。

2、商业教育

“烟台益文商业学校”

民初，实益学馆学生人数较前加倍。1920 年 4 月，长老会决定将会文学校和实益学馆合并，取实益的“益”字和会文的“文”字，定名为“私立烟台益文商业学校”，由毕维廉担任校长。

益文商业学校建立后，设有初中、高中、英文科及商科。一年之后，由于学生逐渐增多，而教室和宿舍不敷使用，学校又进行扩建校舍“思郭堂”。^②据载，益文商专学生，每年在 350—430 人左右。据《烟台概览》记载：“本期学生计分三部十三级。商专部：商三下下级 9 人，商二下下级 11 人，商一下下级 23 人。高中部：高三下下级 14 人，高二下下级 26 人，高一下甲级 25 人，高一下乙级 31 人。初中部：初三下下级 55 人，初二下甲级 30 人，初二下乙级 30 人，初二上级 31 人，初一下下级 46 人，初一上级 17 人。共计 348 人。”^③益文商业学校的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益文学校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如学生毕业时组织参观工厂、军舰、听名人讲演和学术报告。为了争取更多的青年学生入学，提高学校声誉，益文学校采取了较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如对“品学兼优”之生和在校教员子女的学费全免，对长老会牧师子女在普通中学的学费全免，在英文科和商科的学费减半。如学生交纳学费有困难，愿在学校勤工俭学的，按工作的难易程度，每小时给工资二角或三角不等。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益文学校的生源，保证了教学的质量。

学校注重学生的宗教信仰，“星期日上午礼拜日及每日礼拜，无论是否教徒，均须一律参加。”这种现象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北洋政府限制教会学校举行宗教仪式方才改观。^④可见，益文学校是一所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会学校。

育才初级商业职业学校

近代烟台较为重要的教会商业学校中，除了益文学校外，还有烟台私立育才

^①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见《烟台市文史资料》第 1 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编印，第 183 页。

^②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见《烟台市文史资料》第 1 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编印，第 184 页。

^③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 1937 年 1 月出版发行，第 134 页。

^④ 侠僧：《吾校近年来之概况》，见《益文商专己巳级刊》，1930 年第 2 期。

初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育才学校”）。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系由烟台基督教教会组织指导而成立的，于光绪二十九年成立，地址在烟台广仁路，基本宗旨以基督教义为准。1914年基督教青年会主办育才学校，初期为男女合班教授的初级小学校。1919年秋，鉴于烟台埠内中学短缺，为了满足埠内教育的需求，基督教青年会诸位董事决定在烟台坤山路附近觅房数栋，改办中学，名为育才中学。1920年，学校取消小学，转办中学教育。由于育才学校是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校长等人基本都由基督教青年会董事担任。

此外，1912年，烟台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也首次开设英文夜校，主要进行英语学习，培养英语人才，增进学院英文水平。学校属短期培训机构，就学者多为海关、邮电局职员及商场青年。

3、启喑教育——启喑学校

启喑学馆创办初期，经费问题一直是个难题。1900年，汤浦生利用丈夫梅理士牧师逝世后所得的人寿保险及其全部存款，又得到一家银行5500美元的贷款，在烟台东山海滨购地17.50亩，建一栋二层小楼和数间平房新校舍。这时，已收聋哑学生十一人。此后20年间，学校历经艰难，汤浦生常年奔走于社会各界之间，多次西行欧美，通过集会、演讲、放幻灯、报刊、广播等，宣传中国的聋哑教育。“1906年，在美近两个月间公开演讲29次，书写信件40余封，接受多次采访。”在汤浦生的奔走呼吁下，“美国罗斯福总统等曾接见过她，赞扬和支持她的事业。海伦·凯勒呼吁各界帮助中国的聋哑孩子，并以海伦·凯勒基金会的名义捐献700多元美金。美国共有200多处聋哑学校的学生，发起援助中国聋哑儿童的活动。”^①在美国各地聋哑学校的师生及各国热心聋哑教育的人们的帮助下，启喑学校很快便还清银行贷款，并开始扩充校舍。

1909年，启喑学馆正式划归美国（北）长老会本部照管，得到美国长老会总会支持经费45000美元，得以买地28.50亩，扩大校舍，从此开始有了合法地位和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汤浦生还邀请外甥女卡特（Anita E. Carter）来华，协助她开办启喑学馆。1906年，卡特来到山东烟台，启喑学馆同年改名为烟台启喑学校（又名梅理士纪念学校）。^②

启喑学馆开办初期，只设男生部，招生对象仅限于聋哑男童。1907年，卡特主持开设女生部，专门招收聋哑女童入馆学习。1914年，招收到两个班共19名学生。此外，卡特还总结了学校开办的经验，重新制定了办学章程。女生部的设立和新办学章程的制定，扩大了学馆的规模，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使烟台启喑学馆

^①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39页。

^② 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见《烟台文史资料》第1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印，第199页。

开始成为一所男女混合的日趋正规的聋哑学校。学馆学生和教师数量迅速增加,拥有教务处和木工、编织两个部,而且还增设了幼稚园。同时,学校正式定名为“烟台启喑学校”,汤浦生为校长,卡特为副校长,栾雪琴(中国人)担任教务主任。



烟台盲哑学校旧貌

1913年,启喑学校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和改建工作,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近代化启喑学校。在学校开办后的大约10年中,就有“来自全国9个省份的40名聋哑儿童在校学习,其中有一名盲聋哑人,1名朝鲜人。”在1909年上半年招收的7名学生中,则有“宁波1名女孩;苏州1名女孩;登州府男、女各1名;直隶1名女孩;满州1名男孩;沂州府1名女孩。”^①

4、医学教育

黄县怀麟医院附属医学院

怀麟医院位于中国山东黄县,是南方浸礼会建立的第一所教会医院。

1902年,美国浸礼会在黄县建造了怀麟医院,系由J.L.怀特医生牧师捐献的三千美元建造而成。该医院于1903年建成并接待病人。同年,传教士医学博士T.W.艾体伟创办了附属该院的医学院,艾体伟自任院长。怀麟医院附设医学院学制五年,三年基础学习,两年实习。一共办了两期,毕业学生约10人,

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

1911年,烟台毓璜顶医院开业,由于医护人员的匮乏,第二年便创办了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班。初期的护士培训班规模非常小。及1913年美国北长

^① 曹立前、郭大松:《传教士与烟台启喑学校》,《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74页。

老会派遣美籍护士 Aelaiae Primrose · PN 抵达烟台后，^①始征求有志于护理工作的男女青年施以训练。但因习俗守旧，人民普遍对此种职业及教育方式存在误解，大多中国人瞧不起这种“伺候人”的工作，入学者多数不肯久留，训练工作进行困难。直到 1914 年初，才有两名妇女进入医院接受护士训练。

1914 年 10 月 30 日，烟台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培训学校创建。为了更好的建设烟台医疗事业，护士培训学校开始扩大招生力度。同年年底，学校招收学生 11 名（全系男生）。学校遵循“以德性、素质、学程、训练、工作并肩而行”的原则，重视护士素质的教育。开办初期，基督教会委派 A·Primose · RN^②负责学校工作。至 1915 年，始有女性参加护士学校。

1917 年，基督教会又委派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长鲁思·麦克维尔小姐负责学校管理工作。当时教员全部由医院医生兼任，他们一般都是来自齐鲁大学或者协和医院的毕业生。学校教材和参考资料由任课医生自己编写，或向外地基督教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索取。学校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学生每天早餐前都必须到礼堂举行早祷与解经。当时学校还实行“半工半读”制，学生边学习边充当医护人员，但实际上工作重于上课。

由于入学前教育程度的差异，语言和文字的障碍，生活的不习惯等种种原因，学生半途而废者多，新旧交替频繁，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1917 年 12 月 17 日，护士学校第一届学生经过三年的培训后，考试合格并毕业者只有 3 人，“其中两名留医院工作，一名负责手术室工作，另一名在实验室为检验员，有一名毕业生安排去威海卫医院”。^③

1918 年，美籍护士长毕格林担任学校校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护士培训班

1914 年 6 月，美籍传教士毕格尔夫人创设护士培训班，吸收妇女圣经学校毕业生为练习生。

5、培真女子学校——实业教育

1905 年，花边学校规模已经有所扩大，女生数量由 3 人增至 80 人，1910 年前后，已有 150 名学生在不同的部门学习。由于花边学校所取得的成功令人羡慕，花边学校的影响逐步增大起来。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来自烟台花边学校的女孩凭借精美的花边产品，荣获了一枚金牌和两枚银牌，这也给马茂兰夫人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去把花边工作做的更好。

民国成立后，学校取名“培真”女校。随着学校人数的日渐增多，再加上烟台女子教育犹未普及，为了迎合社会需要，学校于 1919 年改办，正式设立女子

^① 《八十春秋 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第 11 页。

^② 《八十春秋 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第 12 页。

^③ 《八十春秋 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第 12 页。

中学，设董事会，聘任专门教员，重建校舍，逐渐成为一所近代化的女子中学。

6、其它教育机构

普通教育：

1908年卫灵女校经过两年的准备，开始正式上课，“限幼稚生和初小，男女兼收”。^①该校从创建到1920年，校长分别是思提芬夫人(Irene M. Stephens)、浦其维夫人(Anna Seward Pruitt)、浦爱德夫人(Ida Pruitt)。

民国初年，美国基督教差会主办真光女子中学，校址设在毓璜顶北坡西马路。一切经费由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友及热心教育者特别捐助。

1914年，烟台热心人士黄伟绩先生，鉴于民国初期旧学废弛新学未兴，失学儿童甚多，联合天主教会，借爱德街天主堂印刷馆后院为校址，创办崇正国民义务学校。学校经费由天主教堂每年出一百吊大钱，其余由校长黄伟绩担负。后因经费拮据，遂向学生征收学费。

芝罘学校在20世纪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校长麦卡锡的努力下，芝罘学校成为一所按照中国内地会的章程运作的基督教寄宿学校，其职员要求全部是内地会的成员。课程以英国体系为基础，课本、教授全采用英制，十分强调古典课程的学习，课程专门设计以使学生能进入包括牛津和剑桥的英国学校，曾被誉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语学校”。

神学教育：

1910年，白尔根夫人创办爱道学校，招收女教徒，施以神学教育，培养女传道人员。

20世纪初年，传教士海雅西和女儿海爱壁创办的简易神学在美国南浸会西差会的安排下，由浦其维接办，学校名称确定为“卜氏神道学”。初期，学校规模很小。后在浦氏为首的中西神职人员的努力下，在黄县买大片土地建校。神学院的规模由此扩充，划分为文科、师范科、神科三部分。文科(后改为崇实中学)由海查理任科长，浦氏本人担任校长。教学内容除神科单纯实施宗教教育外，其余各科从小学一直办到大学，统称为“崇实学院”。

师范教育：

1911年，郭显德夫人苏紫兰在毓璜顶创办了烟台第一所幼稚园，每学期招收学生六、七十名，并于1919年增设了师范训练班，培训幼儿园师资。

1917年，天主教会创办崇德女子中学，原为师范班，校址设在爱德街，仅有学生18名。

^① 曲拯民：《美国浸信会在烟台创卫灵女校，焕文男校》，见(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五卷第四期，台湾文献委员会1964年版，第81页。

三、发展特点

1、办学层次提高，身为教育家的传教士专职教学

20世纪以来，各教会学校不断提高办学层次，由之前的初级水平提高至中级及高级水平，办理了一批教会中学和最早的教会大学，为提高烟台教育水平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登州文会馆在19世纪末宣布具有大学水准后，成为最早的教会大学。虽然文会馆于1904年迁至潍坊，后再迁往济南，但仍然能够对于烟台教会教育具有一定的代表作用。除此之外，大批普通教会中学的设立，基本形成初中、高中两级制，学生须经考核方能入学，这使得教会学校基本具备了世俗专业教育的特征。

与之前相比，教会学校在外籍教职人员水平上有所提高。随着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的成立，掀起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外传教浪潮。进入20世纪以来，受过高等教育并在文化水平和修养方面普遍高于早期的传教士的男女大学毕业生，纷纷来华。早在1902年，中国教育年会曾通过《请求国外差会派遣训练有素的教育家来华的呼吁书》，要求派遣专职教育工作者来华办学。1907年百年大会上再次呼吁“在国外师范院校受过专业训练之传教士”来华担任教会学校教师。^①

在此背景下，烟台教会教育中，出现了一批有较高学位和在某些专业有造诣的传教士成为专职教育家。据连警斋所著《郭显德牧师行传》统计，烟台地区的79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中，有博士或者名誉博士学位的有17人。他们以平信徒（即不受牧师职位）的身份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教育中来，从而成为教会学校新一代教职人员。比如，1906年，启暗学校校长汤浦生（即梅耐德）邀请外甥女卡特来华任教，卡特是当时美国加勒德大学著名的聋哑教授。卡特来华任教30余年，为中国聋哑教育做出了贡献。1901年，美国北长老会派柏尔根博士担任英文馆校长。1905年，北长老会又特派美国西北大学学士毕威廉继任英文馆校长。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教育家。

教师的专业化不仅提高了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也进一步削弱了教会学校通过兼职传教士进行布道的功能。

2、招生条件有所提高

20世纪初，随着风气的开化，烟台教会学校开始得到民众的认可，生源数量大大增加。此时期，教会学校为了提高学校的质量，也开始对于招生条件有所限制，对入校生进行选择性的接收。比如文会馆在招生时要求学生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年龄较大，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征收部分学费等等。烟台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对学生入学有严格要求，1917年学校公布了“入学须知”：“考生必须

^①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身体健康；考生必须持有医院管理人员的推荐信；年龄限于 19~25 岁；受过良好教育，即相当于在中国学校 8 年的水平，算术掌握到分数，最好懂点英语；女性必须未婚，亦未进行过缠足；所有学生如不能确定以往疫苗接种日期，入校时必须重新接种；学校仅接受考生家中生活安排停当者入学；批准入学前，考生必须面见医院的管理人员。”^①启喑学校则规定“收生年龄为七至十二岁”。^②花边学校也明确规定入学前，女孩必须放足。

在学生就读期间，还要严格遵守学校制定的全面的“学校简章”。比如启喑学校专门制定了十二项简章：“入学学生无论远近一律住宿；大学生课余负责清扫、花木之灌溉等操作；学生出游均须有教员率领，概不准私自出校；每礼拜六下午放学半日，为学生沐浴、洗衣、游玩等事，不准出校；亲属探望学生，须先通知校长，须于会客时刻（即下午三点到六点）在客堂会面……”。^③

除此，学生在入学期间还要按规定向学校缴纳学费。相关情况列表如下：

学校	学生人数	学年学费
启喑学校		30 元
益文商业专科学校	297	25 元
真光女子中学		20 元
崇正中学	305	15 元
崇德女子中学	205	10 元
卫灵女子中学	42	8 元
女青年会幼稚园	65	7 元
西山幼稚园	75	5 元
焕文中学	53	6 元
培真女中	67	4 元

（根据《烟台概览》与《烟台大观》等资料整理而成）

虽然，各教会学校对于学生来源有所要求和限制，并且要求收纳一定的学费，但是此时的教会学校已经在生源方面获得了成功，学生数量众多。

3、学校专业性增强，教师以专业教育工作者为主

二十世纪初，随着烟台开埠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已不能满足近代烟台对人才的需求。因此传教士们相继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校或增加了学校科目的专业性，专门为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因此，这一阶段的烟台教会教育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专业性逐渐增强。各教会纷纷主办了一系列的专业

^① 《八十春秋 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第 62 页。

^② 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烟台文史资料》第 1 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编印，第 201 页。

^③ 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烟台文史资料》第一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编印，第 201 页。

学校，开始培养专门人才。

二十世纪初的烟台，埠口洋行和洋人兴办的工厂逐渐增多，但是当地人士精通英语者甚少，而海关、邮电、洋行、航务、使馆雇员等，均是外省人担任。一些有权势的绅商和教徒，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到洋行混事，因此迫切需要办理一所专门学习英语或商业知识的学校。1920年，在毕维廉的主持下，会文书院与实益学馆合并成为益文学校，开始逐步打造一所商科学校，成为烟台地区第一个高等专科学校。除了初、高中课程与一般学校大同小异外，益文学校特别重视英语。商科则减少普通中学内容，增加了商业内容。学生第一年学习打字、银行学、簿记、世界地理；第二年，学商业簿记学、商业地理、商法速写；第三年学商业算术、查账学、交通与运输学、装卸及海关学、商业管理法、速记学。益文学校对学生进行的如此专业性训练，为烟台及周边地区培养了大量外贸商业专业人才。此外，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还创办了烟台私立育才初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育才学校”）、英文夜校。其中英文夜校主要进行英语教育，培养英语人才。

为了满足烟台近代幼儿教育需要，传教士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幼儿教养机构。如1911年，郭显德夫人苏紫兰在毓璜顶创办了烟台第一所幼稚园“毓璜顶蒙养园”，后改称西山幼稚园，是烟台最早的幼儿教养机构。同期还有其他如烟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幼稚园、天主教会创办的崇德女校附属幼稚园等，都是传教士们创办的幼儿教养机构，大大提高了烟台幼儿教育的水平。

师范教育也开始发端，1919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创办了毓璜顶幼稚师范学校。这可算是烟台单独设校的第一所师范学校，意义较大。1917年，天主教会创办崇德女子中学师范班。传教士还建立了专门的医学教育机构——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为烟台近代西医学培养了医护人员。

综上所述，传教士们所创办的专业学校或培训班，大多走在了烟台专业教育的前列，为培养近代所需的专业人才，满足近代烟台发展需要做出了贡献。

除了创办专业学校外，各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开始有了明确的专业化走向。在文会馆的影响下，烟台各教会学校基本上都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博物等课，且宗教课程与宗教活动与专业课都是分开进行的。在教师选聘方面，各学校也纷纷采用专业教师并增加了学历要求，吸纳国内教会学校毕业生，如早期文会馆的毕业生被许多教会学校延聘。如育才初级商业职业学校，除校长及行政人员外，教员共9人，其中大学毕业生5人，专科学校毕业生2人，师范学校毕业生2人。总之，这一时期的烟台各教会学校已经逐步的开始步入本土化和专业化水平，逐渐被民众接受。

4、教会学校开始确立正规的教学体制，本土化明显

20世纪初，教会学校改变了之前由外国差会全权管理的现象，开始在管理

方面出现本土化迹象。各教会学校聘任中国教职人员进行教育、管理工作。比如益文学校、启喑学校、毓璜顶护士学校等，都在外国人把持学校行政权的情况下，相应聘任一批中国人入校，其中大多是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次，各教会开始与中国人合作开办学校，从而使得一批中外合作学校得以创办，崇正中学就是中国人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建立的。

民国后，随着民国政府对教育机构管理的进一步加强，教会中学本土化方向的努力更加积极。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1914 年全国大会有关教会教育事业的议案中提出：“教会所办之教育事业，应与政府所办者相联络，教会学校不妨采用官立学校课程。”民初时期，教会学校大多采用了中国政府颁行的学制系统，“中学修业年限定为四年”^①，课程设置与中国公立学校已无大差异，只在通行教材外，“复加圣经一课”^②。如益文商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初中、高中课程内容与当时的一般学校大同小异。只在社会科中，每周以四个课时学习《基督徒改良社会之目的》。根据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调查显示，1918—1919 年山东省所有教会中学半数以上学校为正规四年制。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鼓励教会学校“在精神上、文字上两方面均须力谋适合中国的标准”，要求各教会学校“注重国文”。^③因此，教会学校在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为了更容易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和信任，要求学生用官话进行演讲，锻炼演讲口才。文会馆便专门组织“高谈、阔论、育才”分组演讲辩论会，以“交换知识、练习口才、造就共和国民资格为宗旨”。辩论会完全仿照美国国会的程序，在辩论会上要求一律用“官话”，如用文言或者地方方言都要罚款。《文会馆志》中称这是“学生共和国之试验场”。除此之外，文会馆在课程内外也大力提倡“官话”。课程中的道学部分如“教会问答”、《圣经》选段都是白话文，也要求学生背诵。

黄县崇实中学也提倡学生锻炼相应能力，例如其毕业生朱某（1920 年毕业），“为浸信会会员，曾在咏诗团、新剧团、女子立志布道团任职，曾任女青年会教部长，少年团团团长……”^④

由此，白话的使用开始在教会学校盛行开来，对于教会教育的本土化及推动中国教育方式的改革意义重大。

^①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教育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2 页。

^②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7 页。

^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6 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7 页。

第四章 烟台教会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发展（1921—1937）

一、时代背景

1、收回教育权运动与立案风波

20世纪20年代教会学校的迅猛发展，众多的教会学校完全独立于国家教育行政之外，逐步引起了中国教育界的警惕。完全独立于中国国家教育行政权之外的教会学校，成为收回国家主权运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因此，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烟台同样受到影响。

二十年代中期，益文学校曾有一个秘密组织叫做“非基同盟”，组织一次小规模的反基督教活动，在学校和毓璜顶东路礼拜堂张贴过“反对作礼拜”、“反对道学课”、“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标语。此举引起学校恐慌，校方明文规定，凡作礼拜无故不到者记过一次，累计*次就勒令退学，后来在学生们的冲击下，校方在执行上也并不坚决。^①

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也逐渐改变了对待教会学校的态度和政策，试图通过立案的方式将教会学校改造成为中国的私立学校。二十年代，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六条》、《私立学校条例》、《私立学校规程草案》等法规，严令教会学校限期立案。1928年6月，何思源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他组织拟定了《山东省教育行政纲要》，在私立学校方面，规定：“限令私立学校重新注册”；“依次收回教育权”；“审查私立学校基金组织及教员学历”；“私立学校由教育厅派员举行毕业考试”。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教会学校的。对于不按部颁课程标准设置课程、有宣传宗教倾向、教育经费不落实、教员学历不合要求的教会学校一律不予立案。

2、烟台教会学校教育权的收回

这一时期，烟台的教会学校大部分都积极地响应政府的号召，进行内部的改造。比如1926年，益文商专由中国人充任校长，结束了其教会学校的历史。在这一时间，传教士们还通过与烟台当地人士合作的方式创建学校，教会出资产，校长通常由华人担任，如信义小学、真光女子中学等。如1923年，长老会决定由教徒王静安接受成美小学，改名信义小学并附设幼稚园。同年，长老会派长老于志圣改组真光女子中学董事会，校中一切事务悉由华人处理。中国人在教

^① 陈耀宗：《益文学校与益文商转补阙》，《烟台文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烟台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3年版，第137页。

会学校董事会占多数席位，中国人任校长，按照教育部颁定的课程标准上课，可以说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已在一定程度上收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当然，这时的教育权收回还不够彻底，比如益文商专虽然改由中国人罗希嘏担任校长，但是实际权力还是被一批外国董事把持，掌握着学校的财权和人事大权。前校长毕维廉虽然卸去校长职名，但仍任教员、校董、总务兼会计。^①因此，收回教育权仍需要长期的斗争。

但是，对于这个时期的烟台教会学校来说，发展迅速。1931年时，烟台有教会中学8所，学生1113人，教会小学19所，学生1972人。在当时，教会中学的学生占了烟台中学生总数的65.5%，教会小学的学生也占了烟台小学生总数的42%。^②

二、教会教育的新发展

1、商业教育

益文商专

民国十六年，益文商专“名噪南北，各界捐助资金者增多，境遇佳转。乃由校董会议决，根据教育部定章，重行改组，将教育主权收回，校务悉由华人管理”^③。1929年陈调元任山东省主席时，对教会学校提出一系列的改革要求。首先要求校长必须是国人。因此，1929年，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并任沪江大学中学部主任的罗希嘏接替毕维廉担任。毕仍留校工作。罗希嘏到任后，将学校改名为“商专”，致力于提高学校的英文科和商科的教学水平。罗希嘏任期内，是益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学生以本省人为最多，全国招生，还有俄籍学生，学生总数600多名，突破了以往的记录。

关于学校人事，20年代的益文商专教职员共计31人，其中美籍人士4人。校董会由12人组成，其中由基督教东海教会区推选代表3人，由烟台美国差会推选代表3人，由益文学生同学会推选3人，并特约3人，合组而成。校中一切兴革，悉取决于该会。^④苏善克德、狄乐梅等人是当时的主要外籍董事之一。

鼎盛时期的益文商专，校址共南北二处。南校为商专部即高中部，设在毓璜顶志新路5号，北校为初中部，设在毓璜顶14号，全校面积占地83余亩，宿舍109间，办公室11间，仪器标本室4间，图书室5间，实验室7间，游艺室2间，辟有大礼堂2座，教室46间，餐厅15间，厨房7间，规模可谓之大。

益文商专尤倡体育，专设足球场一处，篮球场7处，排球场2处，网球场3

^① 曲拯民：《烟台益文商专》，《烟台文史资料》第12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2年版，第41页。

^② 张书丰：《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12期，第84页。

^③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89页。

^④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89页。

处。其足球队，每逢周六总与当时旅烟的欧美人自办的子弟学校“内地会学校”比赛。篮球队也负盛名，在二十年代中期有最令人瞩目的“白燕队”。还有严格的童子军训练，聘请现役军官教练操法，有考究的制服和军帽。设立专门的军乐队，其中还有由俄国学生组成的铜管乐队。^①

益文商专为近代烟台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查该校自民国二年至三十年代，共毕业 1300 余人，就业学生在海关、邮政、银行公司中服务者居多，在政界供职及致力于教育者也有一些。其中远向外国经营贸易者，尤为该校学生特色，有益文学生足迹五洲之称。^②

商业职业学校

商业职业学校，原名即“育才初级商业职业学校”，由烟台基督教青年会主办。因学生日增，烟台埠内商业发展迅速，商业人才需要增多，再加上烟台教育当局提倡职业教育，因此至 1925 年秋，学校改名为商业职业学校。学校的基本费用来源，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及学校建校初的基金利息，不足时再向青年会申请补助，学校设商科，修业期限为三年，规模较大时曾收学生三个班，并设商科预备班，修业期限为一年。毕业生自 1917 年至 1935 年，共 104 人，其中经商者 42 人，占二分之一。

2、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医学教育

1926 年，护士培训学校被批准成为中华护士学会立案学校之一，当时是全省第一个成为中护会的立案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修业期满，经考试合格，由中华护士学会发给毕业证书。1931 年后，随着口岸的逐步开放，社会风气开始逐渐开化，人民习俗略变，报名参加护士学校的人逐渐增多，并且学生也有初期的以男性为主变为以女性为主，毕业生人数也由原来每年的 2—5 名，增加到 10 名左右。比如，1937 年护校毕业生共 11 人，并且全系女性。但是，由于护士学校的要求非常严格，也有不少人因不能按期毕业而辍学。

1933，美籍护士长陆瑞德（耶鲁大学护理系毕业生）接替毕格林兼任护士学校校长。此时，护士入学不再像之前那样简单，除了要有相关人员的妥当推介外，每个学生还要向学校交纳保证金 25 元，六个月试期合格，然后才能“加冠”。“护士的训练课程，包括紧张的课堂教学和监督指导下的病房、手术室、食堂及门诊部的实际训练。护理服务不分昼夜。”^③此外，护士们每周还可享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每年还要彻底检查体格一次，由此可见，护士学校的制度是相对严格而富有人性化的。

^① 曲拯民：《烟台益文商专》，《烟台文史资料》第 12 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1990 年版，第 42 页。

^②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 1937 年 1 月出版发行，第 90 页。

^③ 【英】阿美德（A. G. Ahmed）：《图说烟台（1935-1936）》，陈海涛、刘惠琴译，齐鲁书社 2007 年版，第 156 页。

1937年2月,根据南京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护士学校均由国人担任校长职务的规定,基督教会被迫改由聂荣贞继任校长职务。1926—1937年12年间,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先后共获中华护士学会考试合格并发给证书的毕业生共77人,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7%。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是,毕业生的学识、修养、技术与责任心等受到各地医院的称赞。“本护校毕业生,不拘服务本省农村,或在华北各地任何医院工作,她(他)们的学识、修养、技术与责任心受到称赞,有口皆碑。”^①

在此期间,学校有了自己的校歌,现摘录如下^②:

遥望绿水清波天色共苍茫
近依毓璜山岑峦光蓬莱傍
胜地独揽建设我校福一方
伟哉福民功业日进永无疆

副歌:

声闻令誉洋溢乎中外列邦
慈惠心泽广被乎胶东各乡
良医良相为斯民之保障
山上坚城台上灯光亿万斯年无限量
黄县怀麟医院附设护士学校

1926年,黄县医院及附设医学院院长艾体伟回国,医学院因此停办。后经数月整顿,黄县医院又开设了怀麟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培训护理人员,男女兼收。该校于1940年以后停办。

3、女子教育

真光女子中学

学校原系由美国基督教差会主办,随着20年代“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开展,在1923年,烟台教育界于子明等16人,为收回教育主权起见,特联合差会代表伊维廉商妥,交付华人自办,并借助前会文书院为校址。之后,校中一切事宜,悉由华人处理,基督教差会不再干预。在此基础上,学校重组校董会,募集大洋三万元,重建校舍。从此,教学条件及效果大为改观。二十年代的真光女子中学,共有校舍、教室及办公室40间,宿舍30间,图书馆3间,实验室3间,“殊非往昔所可比拟也”^③。校中有外籍教师“英文教员伊姑娘、琴师梅姑娘、音乐长狄师娘”^④等人

^① 曲拯民:《烟台毓璜顶医院与护士学校》,《烟台文史资料》第八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7年版,第22页。

^② 《八十春秋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1994年出版(内部刊物),第64页。

^③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99页。

^④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00页。

鉴于烟台埠内没有女子高中，真光女子中学初设立时曾增办高中，1922年秋季，因为经费支绌，只得停办。学校学制按新学制编制，初级中学三年，师范两年。其毕业生多半充小学教员，为近代女子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崇德女子中学

民国十年，天主堂各修女院筹资兴筑楼房一所，将原先校舍内外修缮，学校状况大为改观。学生人数也有之前每年寥寥十几人，一跃而增至30余名。

民国十八年，“因奉教育厅之令，私立学校设师范班于定章不符，改为初中，一切设施，悉尊教部”^①。学校费用来源，是由天主堂备银元三万作为基金，房产两处，共计国币六万元，以房租和基金利息为经常费。再加上教堂募捐，及每年学费1400元，资金较为充裕。

由于天主堂的介入，学校基本由外人把持，校董事由15人组成，外籍人员占据三分之一。学校设师范、初中、高中三部，各门课程悉尊教部之课程标准。学生毕业后，升学者占三分之二，其余走上社会，其中五分之一的学生加入天主教，成为信徒。

学校重视体育运动，专设体育教员一名，童子军训练一名，专门指导学生运动。除了体育课之外，学校还设专门人员在课余时间指导进行有纪律的课外运动。

培真女子学校

培真女子学校成立后，马茂兰夫人担任校长。1925年，马茂兰夫人逝世后，学校的教育工作由其女儿继续。二十年代，学校经费每年大约需4500余元，由学费收入及董事会补助，收支大约平衡。学校后增设新式楼房一座，共80余间，内有礼堂、教堂、自习室、宿舍、办公室、图书馆等，外有平方数十间，再加上操场、运动场各一处，学校地址虽不宽敞，但仍可称为一所设备完备的近代化学校。



民国初年的培真女校

^①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01页。

在学制方面，尊教育部令，培真女校采取三三制编制^①，课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初中课本，并采用启发自动教学法及辅导法等新式教学法进行教学。学校重视训育，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等良好习惯，激发学生向上进取的精神及服务人群改良社会的能力。学校还设专人指导学生们练习各项球类，练习各种柔软体操等，为培养健康的新式女性做出了贡献。

4、华北浸会神学院——神学教育

1931年，通过美国南浸会西差会和中国浸会联合会共同决定，将卜氏神道学改组为“华北浸会神学院”，专门承担培养输送神职人员的任务，成为高级的独立学院，特聘牧师柯理培（C. L. Culpepper 美籍）任院长。教员由外籍牧师及中国人士组成，院经费大部分由西差会拨款，浸信会华北议会也负担一小部分。1936年，神学院学生达一百多人，凡来校学生男女兼收，年龄不限，只要“蒙神召选”，誓愿终身作教牧的人员，通过当地教会介绍或教会负责人的举荐，均可报名，经院方审查批准，即可取得学籍来院就学。^②

学院分圣经（学制两年）、神学（学制三年）两科，1936年后增设高等神学科，专为具有神学毕业资格或文化水平相当大专程度以上的神职人员，进一步作高深研究而设。学院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设有男女学生会组织，以便协助院方团结同学，共同搞好全院事务。对于男女生实行戒禁政策，在课堂和会堂里，男女分排而坐，无事不得互通语言。学院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上课时先祈祷，上午上完两节课后还有半个小时的间隔礼拜，师生汇集二楼礼堂，或唱诗或祈祷或讲经，晚饭后还有夜祷。礼拜天的活动更加频繁，大部分学员去礼拜堂作礼拜，另一部分当值的学员还要分头下乡主领家庭礼拜，晚上赶回来参加汇报会等等。

1936年是学院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教师数量达到19人，学员将近150人。其中，刚设立的高等神学科录取五名学员。

5、普通学校

崇正中学

民国三年，天主教会与中国热心人士合作创办崇正中学。受到“收回教育权”运动及“立案风波”的影响，20年代初期，崇正中学按照规章在教育部立案^③。

1921年，学校有了较大发展。在初中的基础上，增办高中，学生数目也与日俱增。1924年，中学部移到烟台海岸路。1925年，因筹备初中立案，再加上高中人数较少，学校董事会决定取消高中，专办初中。

按照教育部规定，学校采用三三制编制，初中三班，一二三年级各一班。教

^①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02页。

^② 刘信纯、张铁砚：《华北浸会神学院见闻》，《烟台文史资料》第四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5年版，第126页。

^③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97页

师基本聘任专业人员，比如 30 年代初，学校共有教员 11 人，其中师大毕业者 1 人，大学毕业者 5 人，高等师范毕业者 3 人，专门学校毕业者 2 人，师范毕业者 2 人，其他 2 人。为了增强教学效果，教师在授课时多“采用诱导式，使学生自动研究，教师随时指导之”。^①学生入学需要缴纳学费，其中每学期缴 11 元，杂费 4 元，书籍等费自备。

学校重视体育，设有体操、童子军训练、田径赛及各种球类等项目，每天除了正课之外，要求学生应运动一小时。

私立信义小学

1920 年，会文书院中学部与实益学馆合并，定名为烟台益文商业学校，其小学部仍然保留，校址不变，而在行政上改为由中国人自办，最初改名成美小学，1923 年改为私立信义小学。

信义小学虽由中国人自办，但仍延续之前教会学校的各种特点和形式，一直是烟台著名的小学，并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信义小学采用近代化的教学方式，而且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近代化精神，如学校的校旗、校徽和校歌都使学生有较为深厚的归属感。1936 年，信义小学曾编印校志，其中包括图画若干，并收录了校歌一首，摘录如下：

“蔚哉秀哉，信义小学，壮丽美且崇。同学同学，相爱相敬，学校如家庭。信义信义，成绩优美，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社会明星，学校有光荣。”^②

校歌歌词通俗浅显，内容简单，多用叠词，朗朗上口，适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文化程度，也体现了学校的近代化色彩。



6、其他

启喑学校

启喑学校在二三十年代继续发展。1929 年，梅耐德病逝，葛爱德继任校长。不久提任栾雪琴为副校长。为培养聋哑教育师资，学校在葛爱德的主持下办了一期师范班，上海、汉口、天津、北平等地皆有人参加。1934 年又办了第二期。

^①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 1937 年 1 月出版发行，第 97 页

^② 《烟台晚报》，2007 年 10 月 13 日，第 11 版。

1936年,启喑学校教师增至13人。学校使用的教材,全系翻译美国聋哑学校的课本。1926年明确规定幼儿园学习国语、体操、工艺,设八个年级。1930年后废幼儿园,设预科三年,有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和科学的教学方法。

芝罘学校

1923年,由于芝罘学校校长麦卡锡先生的健康原因,捷德先生被临时任命负责中国内地会子女学校男校的工作。1930年春天,剑桥大学毕业的布鲁斯(P. A. Bruse)先生接替麦卡锡先生正式担任芝罘学校校长职位。在布鲁斯领导时期,芝罘学校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包括在1930年成立了芝罘管弦乐队,中文学习的教育,甚至开始成立一个女导游公司,1934年引进协同教育,同一年还成立了一个新教堂和预备小组。

1936年,芝罘学校有超过300多名孩子和工作人员,他们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组织,有自己的面包房、洗衣店、冷饮店、木工房等。学校的师资非常雄厚,其中包括多名剑桥、牛津等大学毕业的学生,使得学校能够以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从初级证书一直可以达到牛津学校的毕业证书标准。学校强调对宗教的教育,校长每天都进行祈祷,有两次礼拜服务。一学年有四学期,分别于二月、四月、八月和十月开始。学校依然重视体育和游戏课程,如果没有参加过烟台所举办的各类运动活动,学校也不能给予登记相应课程成绩。学校宽敞的操场上也经常有儒雅礼貌的成年人在玩板球或足球,偶尔还举行一些比赛。^①

1923年,中华基督教会管辖的真光女中开设了幼稚师范科,两年制。1926年,益文商专也专设师范科,分小学组和幼稚师范组,三年制,分别进行师范教育。

1923年,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大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举办烟台平民学校。第一期办男校41个,共70个班,学生人数达1466人之多;女校13个,共30个班,学生高达2099人。

三、发展的特点

1、与现行教育制度接轨,纳入统一教育体系,更中国化

2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教会人士加紧向政府立案,以继续保持教会学校的稳固地位。在立案风波中,烟台各教会学校积极行动,向山东省教育教育厅申请立案,对于自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比如由中国人担任校长(益文商专、启喑学校)。有些学校还开始改变之前的教会学校色彩,改由中国人自办,如会文书院小学部改名为私立信义小学。各教学学校对学制也进行了相

^①【英】阿美德(A. G. Ahmed):《图说烟台(1935-1936)》,陈海涛、刘惠琴译,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70页。

应的修改，与现行教育制度接轨，从而较为成功的被纳入统一教育体系中。

对于山东教育行政在教会学校立案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很多教会学校开始调整办学政策以谋立案。比如，益文商专、启喑学校、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等学校纷纷推举中国人担任学校校长，将宗教课定位选修，不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

三十年代初各教会学校情况一览表：

学校	校址	建校时间	校长	班级
益文学校	毓璜顶	1920	汪祥庆	商专、初中、高中
真光女中	三马路	光绪末年	葛协五	师（一）、初中（三）
商业职业学校	海岸路	民国三年	王震东	
卫灵女校	大马路	1906	欧瑞德（美）	初中（三）
崇正中学	海岸路	民国三年	黄烈卿	初中（三）
焕文中学	十字街	民国十三年	张宝灵	初中（三）
崇德女中	爱德街	民国七年	韩飞	高（二）初（三）
培真女中	三马路	民国八年	时香雪	高（四）初（三）
启喑学校	东山	光绪年间	葛爱德（美）	

（根据《烟台概览》与《烟台大观》资料综合而成）

毓璜顶医院护士学校于 1926 年被批准成为中华护士学会立案学校之一，成为当时全省第一个成为中护会的立案学校。同年，烟台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开始按照中华护士学会的要求，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修业期满，经考试合格，由中华护士学会发给毕业证书，同年冷书章等 4 名毕业生则为第一届。^①

当然，有些教会学校因为办学条件差而未获得立案的，也有坚决抵制立案的，如黄县崇实中学，在教育厅的多次催促下仍“拒不立案，依然如故”^②，为此学生们曾掀起一场反基督教、争取立案的学潮，美籍教士对此十分恼火，当时受到学潮影响，学院一度曾陷于停顿的困境。

随着中国教育制度的逐渐完善，1922 年，民国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六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三年，高级三年”^③。1922 年年会上，山东北长老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为了与新的政府制度以及中国教育调查团的报告相一致，我们所有的学校应该采用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学年在秋季开始。”从 1923 年开始，山东北长老会所有的学校均采用教育部规定的六六四学制。如华美高等小学堂因此改名“华美学校”，班级编为初中一、二、三年级各一个班。真光女子中学采用初中三年制。

^① 《八十春秋 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第 15 页。

^② 《山东省各县市 19 年度教育报告》第四册，山东省政府教育厅 1932 年印，第 1396 页。

^③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教育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2 页。

在特殊教育中,启喑学校幼儿园采用八年制,后于1930年度幼儿园,设预科三年,预科学完,进普通科学学习六年。普通科学学习小学课本和自编的启喑初阶。启喑学校还规定,班级编制每班不超过十人,采用严格而正规的学制,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2、合并办学,教会学校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国民政府时期,教会不仅仅关注学校数量的增长,更着眼于办学的实际效果,也就是效率的提高,这是对早已开始的强化基督教教育质量的延伸。其“更有效率”主要体现在办学、教学质量、经费和教学设施方面。

在大规模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20年代,烟台教会学校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并校。尤其是同一差会举办的男、女学校合并,教会学校开始由分散办学向集中办学方向发展。20年代,会文书院和实益学馆合并成为益文学校,之后的信义小学和真光女子中学即在原会文实益旧址上成立的。北长老会于1919年成立的毓璜顶幼稚师范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末并于真光女中。以崇正中学校为例,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开始出现。在这一时间,传教士们通过与烟台当地人士合作的方式创建学校,教会出资或房产,校长通常由华人担任,如信义小学、真光女子中学等。如1923年,长老会决定由教徒王静安接受成美小学,改名信义小学并附设幼稚园。

教学要求严格,教学质量高。如1929年罗希瑕接任校长之位后,致力改革提高原英文科和商科的教学水平,充实了许多课程,学习标准要求达到清华大学经济系水平,教师授课概用英文版本,师生间对话亦以英语为主。1926年,毓璜顶护士培训学校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考试水平达到中华护士学会的统一标准,考试以八种主课为至低限度,统一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由于此类要求非常严格,也有不少人因不能按期毕业而辍学。

在经费方面,教会学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而且较为充足,教学设施齐全。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外国差会及宗教人士、校友、社会人士的捐献及学生的学杂费。20年代初期,各教会学校已经向学生收缴学费。学费及各种捐款收入,使教会学校的经费较为充裕,办学条件能够不断完善,各类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等一应俱全。如益文商专的体育设施之全和活动场地之多,在当时居烟台各学校之首。启喑学校在1919至1923年间,因募得经费较为充足,所以扩建校舍,新建了楼房六座,其中教室七十六间,办公室十六间,男女宿舍二十间,礼堂十间,游艺室十间,另设洗澡间、厨房、食堂、成绩室、接待室等,教具、校具、标本也作了充实。^①

3、更基督化

在经历了20年代中期的反基督教运动和20年代末的“立案风潮”后,教会

^① 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烟台文史资料》第一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印,第203页。

提出了“更基督化”的主张，主张培养基督化的人格作为学生德育的标准。在“更基督化”方针的引导下，很多教会学校的宗教活动以看似松散、自由，实际上却更加集中、有序的开展起来。比如，长老会在1934年明文规定：“教会设立学校之宗旨，须高举主基督、宣传福音为主”“所有之学院必须遵守日常礼拜，且以圣经为必修课。”1935年的报告中“幼稚园”项内写道：“最要紧的就是叫他们认识上帝，跟从耶稣，有基督教的思想，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载下牢固的根基，永不动摇”^①此外，此时的华北浸会神学院的扩建，采用完全的宗教教材《圣经》，带领学生进行严格的礼拜、祈祷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益文商专按长老会的规定各年级都设有道学，每周三课时。高中三年级及商科三年级的第二学期，还在社会科中，每周以四个课时学习《基督徒改良社会之目的》。其中，关于“星期礼拜与平日礼拜”规定：周日有宗教聚会两次，午前大礼拜学生到否听其自由，下午有主日学或勉励学，学生必须到会。平日礼拜学生必须到会。学生信教自由并不勉强，但有几种宗教科目必须按章修学。此外，还在校规中规定：“平日礼拜不到者记小过一，礼拜日午后之宗教聚会不到者记小过二。”“小过满十五或大过满三者即退学。”^②为了方便师生就近作礼拜，1922年春天，烟台长老会分会派来了一个委员会到学校，组成学校教会，设立教堂。1937年春，组织了“基督之友会”；吸收教员和学生参加，每周单独聚会，学习圣经、作祷告和讨论怎么发展组织。教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学校的传教工作很有成绩。比如烟台长老会年报1918年记载：“青年会的会员去秋只130人，今春增加为160人，占学生的四分之一。”1922年2月公报记载：“在375个入会的学生中，有83个是教会的会员。”^③

在教会的精神引导之下，有些学生受到影响，比如有一个幼稚生，在正月初九玉皇诞辰的庙会上，对一个向泥塑神像磕头的人说“他是假神，不是真神”。^④

不仅如此，就连启喑学校的聋哑学生也必须背诵“祷文”学唱“圣诗”，并曾在1935年6月13日全市学生“主日学”联合大会上公开表演。毓璜顶护士培训学校还规定，本校学生每天早餐前，都必须到礼堂举行早祷与解经。

在教会学校宗教教育之下，有些学生开始信奉基督教，成为其忠实的基督徒。比如崇德女中，信仰天主教的学生大约占据了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二十。^⑤培真女校，在校学生90人，信仰宗教的学生就有45人之多，占据了二分之一^⑥。由此可以看到基督教对于这些学校学生精神和生活的巨大影响，为他们培养了一批服务宗教的人。

^① 赵海涛：《美国在烟台的传教事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未出版版本，2007.04，第11页。

^②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烟台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印，第186页。

^③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烟台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印，第186页。

^④ 政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芝罘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4月，第53页。

^⑤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01页。

^⑥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03页。

第五章 烟台教会教育的衰落（1937—1949）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教会学校的发展一波三折，尤其是烟台地区的教会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多学校被接管并遭到破坏，从此一蹶不振。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烟台教会教育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还没有与英美等国关系破裂，所以英美教会设立的学校得以在日伪监督下继续举办。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区内英美盟国的传教士遭到迫害。有些教会学校被封闭停办，有的校产被没收，改为所谓“公办”学校，这是教会学校举办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

1、启喑学校——启喑教育

1937年，启喑学校规模有所扩大，拥有教师十三人。同年，美国北长老会从菲律宾聘请美籍聋哑教师魏德凌（女）来华，担任启喑学校教师。1939年，校长葛爱德期满回国，由魏德凌接任校长之职。在1941年12月8日的太平洋战争后，魏德凌回国，栾雪琴任校长，后为王昭宁（女）担任。启喑学校被日军接管，改名为烟台市立启喑学校。在日寇的摧残下，学校的教具、标本损失很多，学校日渐萧条，学生有五十人左右，但教师仅剩七人，教学质量大受影响。

2、毓璜顶护士培训学校

1938年2月3日，日寇侵占烟台并接管了烟台毓璜顶医院，此后学校是否继续招生，情况不详，但每年均有毕业生，1938—1944年，共有毕业生73人。

1942年，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学校校长由医院院长项乃曦兼任，当年即招收学生20名，学制3年，除开设基础课、临床课以外，又增加了日语课，直至1945年，这批学生毕业后，学校停办。

3、华北浸会神学院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华北浸会神学院也掀起了风波。有的师生坚信“天堂是我家，世界无可挂”，甚至还认为战争的灾难是上帝加给中国人的惩罚；有的学员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毅然决然走上了既爱教又爱国的道路，投身抗日。

1938年，在外籍神职人员的主持下，学院挂起了美国国旗，以免受交战国双方的侵犯。1940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学院部分美籍人员奉召回国，还有部分没来得及撤走，包括院长柯理及几位牧师和教士被扣押，后来辗转遣返回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华北浸会神学院被日军作为美国财产而被查封，从此停办。

4、益文商专

在七七事变后，益文校长为燕京大学毕业的汪庆祥，汪善辞令，周旋于日伪宪警之间，维护学校。此时学校美籍教师阵容依旧，加上美长老会的财政支持，珍珠港事件前，学生总数达 420 余人。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籍教员被拘，教学无法进行。1942 年，日伪接受益文商专改为“市立二中”，益文商专因此告终。^①

5、芝罘学校

1937 年，日本占领了烟台，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被视为中立方，学校日常活动正常进行。1941 年 12 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切开始改变。学校校长布鲁斯很快被监管起来，日本军队控制了学校财物。1942 年 12 月，学校职员和留下的学生被拘押于烟台毓璜顶的日本拘留所。1943 年夏，他们被移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才获得自由。

二、抗战胜利后的烟台教会教育

194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武装部队向日伪占领区发动大规模攻势，先后解放了包括烟台、威海在内的大片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山东分局对教会和教会学校的态度是，“对于教堂，以侵略国德、日、意所设应予没收，其余盟国教堂应予以保护，并向我登记，遵守我抗日法令，且准许传教自由，不得随意破坏。”^②因此，烟台解放后，民主政府接受了德国天主教会所办的崇德中学和崇正中学、张家窑小学等学校。1946 年，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天主教耶稣教会问题的初步指示》，强调了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教会学校继续开办，但不能放任不管。1949 年 9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强私立学校管理的指示》，要求对教会学校加强领导管理，积极改造；对已停办者一律不准恢复；对新设者不予批准。同期还有《私立学校暂行管理办法（草案）》规定：“私立学校不得设立宗教课程，或利用学校以宣传教义，更不得强迫学生信教及在校内举行宗教仪式。”^③

抗日战争结束后，各教会试图恢复之前的学校，但困难重重。随着国民党发动内战，及中共解放烟台，烟台地区的各教会学校基本上被改造整顿，教会教育逐渐退出了烟台教育的历史舞台。

启暗学校，1945 年 8 月烟台首次解放后，校长王昭宁逃去青岛，马秀芳接

^① 曲拯民：《烟台益文商专》，《烟台文史资料》第 12 辑，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 年 2 月，第 41 页。

^② 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5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62 页。

^③ 山东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9 年第 1 期，第 81、84 页。

任校长。教师只有赵以渊等五人。由于国民党侵占后遭蒋军破坏，强借硬要，社会上一批歹徒又乘机偷盗，致使学校器具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甚至连地板都被抢走了。1948年春，学生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只得把近20名学生全部遣散回家。至烟台二次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整顿，1948年11月20日正式复课。学校改名为烟台市聋哑小学，赵以渊担任校长，后因反革命罪被处决，由张纫秋接任校长。

益文商专在抗战胜利后被接管，更名为“毓璜顶中学”，成为公办学校。华北浸会神学院在日本投降后，曾一度积极开展复校活动，但因胶东解放战争烽烟遍地，终不了了之。

战后，芝罘学校再也没有返回芝罘，后辗转牯岭办校。1951年，芝罘学校的所有教职工及学生转道香港离开了中国，自此芝罘学校在中国终止了。

第六章 结语

——烟台教会学校教育的历史评价

一、教会学校教育在烟台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分析

1、近代教育思想和体制的传入

近代教会学校的办学模式基本都源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借鉴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而言具有先进性。因此，烟台教会学校教育对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体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教会学校打破中国传统教育的门第限制，吸收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学生，传播教育平等理论，从而推动了近代新型国民教育模式的产生。文会馆、文先小学、会英小学等办学初期，大多招收的都是贫苦的学生，后来也从未对学生家庭有所要求。在教育内容方面，教会学校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儒学经典的学习，而是开设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尤以文会馆最具代表性。

年级	课程				
第一年	《新约》马太六章	教义问答	分字心算	笔算数学-上	
第二年	《新约》以弗所哥罗西书	圣经指略-上	地理志略	笔算数学-中	乐法启蒙
第三年	《旧约》	圣经指略-下	诗篇选读	笔算数学-下	地理志略
第四年	天道溯源	代数备旨			
第五年	天路历程	万国通鉴	形学备旨	圆锥曲线	
第六年	救世之妙	省身指掌	八线备旨	测绘学	格物
第七年	天道溯源	量地法	航海法	格物-声光电	地石学
第八年	《新约》罗马书	物理测算化学	代形合参	二十一史约编	动植物学
第九年	心灵学及是非学	富国策	化学辨质	微积分	天文摘要

（根据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资料制作，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7-218 页。）

登州文会馆在成为大学以后，所设课程除儒家经典及神学外，自然科学占三分之一的比重。学生在最后一年还要学习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三门课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

教会学校除了进行宗教道德教育之外，还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等各方

面的全面教育。除了以科学教育为主的智力教育外，教会学校大多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课，训练童子军，开设美术及音乐课，重视训育。德育方面，崇德女子中学专设训育主任及训育员，专“教导学生，养成善良习惯与高尚之礼节，并奖励有益青年身心活动之组织，以增长其社会常识，而养成其服务耐劳之本能”^①。体育方面，如会文书院开展体育活动，即为烟台现代体育之始，初时烟台许多民众认为学校设体育运动会误人子弟，有的家长则令子女退学，但随着体育活动的普遍和清政府新式学校的设立，民众才逐渐接受。益文学校聘请美国西北大学体育系毕业的贝克为专职体育教员，这大约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名“洋教头”，他主持成立了六个篮球队。益文学校还建立了烟台首座体育场，各中小学运动会均在此举行。学校还专设有童子军，训练严格，聘现役军官教练操法，制服和军帽都很考究。后来崇正中学建立了设备较为完备的体育场，包括田径、足球、排球、篮球、网球等。1931年烟台共有篮球队20余个，其中“白燕”队屡胜美国水兵“黑鹰”队。体育活动在烟台逐渐普及。郭显德也公开提倡体育运动，号召学校实行军训，强健学生体质。音乐方面，狄考文夫人在文会馆最早开设近代音乐课，并编写了教材《乐法启蒙》，后来被其他学校作为教材使用。真光女子中学专设音乐课，教授学生弹钢琴，培养音乐人才。

传教士们在开办普通教育的同时，还注重开展特殊和专才教育。传教士将启喑教育传入烟台，将残疾人与健全人一视同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烟台启喑学校的创办和师范班培养训练出的一批聋哑教师，对发展中国的聋哑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创始人之一，梅耐德于1908年冬亲自带领启喑学校的全体师生进行了一次旨在宣传和推广启喑教育的长途旅行。这次活动扩大了启喑学校的影响，也引起了清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使“政府对此有更大兴趣，制定了试办启喑学校的计划。各地教会学校也将选派正常学生到烟台启喑校接受训练，以为开设这类学校的师资。”^②烟台启喑学校的创设，将西方先进的启喑教育方式传入中国，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启喑教育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此外，传教士们还陆续在烟台开办了专门培养外语、商业、技工、医学等专门人才的学校。比如韦丰年的英文馆是专门培养英语人才而设的；益文学校则侧重于培养商业人才，学生科目中也减少普通中学内容，增加打字、银行学、簿记、商业、算术、查账学、行业管理法等商业内容，并培养了大批商业人才；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则是一所专为培养护士而设的教会学校，也是近代山东第一个成为中华护士学会立案学校。这些专门学校的设立，为近代不断发展的烟台社会培养了所需的人才，从而为烟台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教学方式上，教会学校也引入了比较先进的近代教育方法，在学校中分科、

^①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97页。

^② 曹立前、郭大松：《传教士与烟台启喑学校》，《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74页。

分班和分级教学,提倡试验方法等等。比如,1872年,狄考文改变文会馆学制,设高等科,置“正斋”(高等学堂)和“备斋”(高等小学堂)两种体制。文会馆注重试验方法,“诸凡化学实验,求质辩数常用之器具,药料”。学生第一次有机会在实验室中验证所学的科学知识,而不再笼统的用“元气”、“金、木、水、火、土”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①专设工作房和理化室。其中化验室有各种药品、药水,以供教学实验使用。^②试验方法的使用,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对提高教学效果作用显著,后被其他教会学校采用,都设有实验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益文商专则在分班和分级教学方面更为细化,学生分商专、高中、初中三部,其中商专部分三级,高中部下设四级,初中部下设六级。^③

教会学校是被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堂,西式管理、课程和西方化的校风使得教会学校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的引进者和介绍者。教会学校的设立,打破了我国传统教育的单一模式,实现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结合。一方面,教会学校受其传教士学习背景影响而采用西方学制及教法,使在校学生学到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知识,培养了一批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才。教会学校的学生,由于英语学习的锻炼,大多可以在开埠后的烟台外企供职。相当数量的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为传播新式教育模式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教会学校对中国传统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维新运动及清末新政时期,大批的采用新式教育模式的中国学校建立,其中聘任了相关的传教士或者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担任教职,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教会学校的开办,为烟台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烟台近代社会的发展。

2、女子教育的兴起

中国女子接受学校教育,是以教会学校为发端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使绝大多数女性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和“三从四德”的儒家伦理钳制着中国女性的心灵,女子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女学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点”。^④

近代教会女学的发展,恰好为中国教育填补此类空白。1862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在登州创办女童寄宿学校,后改为文会女校,成为近代烟台女学的发端,开山东女子教育之先河。光绪年间,传教士马茂兰夫妇开设了烟台花边学校,后改称培真女子学校。该校虽然是工读学校,以教授针织、花边绣花为主科,但也开设了文化课学习文字,课本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初中课本,让学生在学学习针织技术赚钱的同时也学到了一定的文化。1918年,天主教圣塞巴斯

^① 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105页。

^② 蔡玉臻:《登州文会馆》,《春秋》2003年第3期,第48页。

^③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34页。

^④ 陆著:《鸦片战争后教会女塾在中国的兴起》,《史林》1990年第4期,第54页。

谦修女院在烟台爱德街开办崇德女子中学，设初、高中两部。在这所学校中，除了普通的教学课程外，还开设了小学和幼稚园，由于学费低廉，吸收了大批学生，每年毕业约有百余人，在烟台较有影响。1923年建校的真光女子中学，是烟台最具代表性的女子学校。该校是由北长老会联合华人办理的，到1936年为止，历届毕业生学生共160余名，“毕业生大多择业教员，少数初中毕业生读护理，升学以齐鲁和燕京为对象。今日在华北各地担任音乐和钢琴教职尚未退休的校友有多名。其第二代在音乐界负盛名者为数很多。”^①

女性的在学教育，使其学习了文化，开拓了视野，扩展了兴趣，解放了思想，使其能够理智的步入社会，从事社会活动。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指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利落，而无所粘滞焉。”^②尽管西方传教士倡导女子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在妇女中扩大宗教势力，但它对于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有力冲击是不容否认的。通过在教会女校中的学习，烟台女性自蒙昧中觉醒，开始追求新知识，努力争取解放及实现自身价值。因此，教会女校的教育活动，对烟台女性的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女性们“就是这样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开始接受现代启蒙教育的，教育启女性之心智，去女性身上千年尘垢。”^③

烟台的教会女学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普通教育体系，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等各部分，而且还涉及了启喑教育、实业教育、医学教育等门类。其中，马茂兰夫人的烟台花边学校和梅理士夫人的启喑学校，在全国教会学校系统中颇具声望。其中，启喑学校在葛爱德来华初期增设女聋哑学房，教授女生花边、台布、绒工、缝纫及烹饪技术。花边学校则使入学女孩们学会了赖以谋生的技能，女孩子们可以不必出门，不用付成本，在家中利用简单的工具赚取可观的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则在“入学须知”中提到，“女性必须未婚，亦未进行过缠足”。由此可以得知，学校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生源。

各教会女学的学生，虽然有些毕业后仍然扮演家庭妇女的角色，但大多学生还是在毕业后走上了社会。比如，真光女子中学的历届毕业生共160余名，“其毕业后生活状况，多半充小学教员，升学者次之，辍学料理家政者再次”^④。培真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中，“升学者及做事者占半数，家居者占半数”^⑤。虽然烟台教会女校数量不多，毕业生数量有限，但毕竟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发端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烟台教育逐渐扩大了女子教育的规模，为解放女性

^① 曲拯民：《烟台教育发展史话》（非卖品），烟台图书馆藏书，第103—104页。

^② 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③ 顾邦文：《近代中国女性与基督教启蒙》，《当代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页。

^④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99页。

^⑤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102页。

思想，提高女性社会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批女传教士投身到教会学校的活动当中，比如倪维斯夫人、狄考文夫人、马茂兰夫人、汤浦生女士、卡特小姐及天主教修道院的修女们。虽然她们所教授的知识大多是经过教会“净化”的近代西方较为落后、保守的部分，一定程度上延迟了中国女性对西学全面认识的进程，但她们的教育活动都为发展烟台地区的女子教育做出了贡献。再加上教会女校的部分学生毕业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因此教会女学为以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为中国的妇女运动培养了最初的人才”^①。

3、培养近代新式人才

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实现基督教化而积极办学，不仅给因为学费而无法上学的穷学生一个上学的机会，而且客观上培养了一批有近代文化的人才，为烟台乃至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的开展做出了贡献。

在培养现代人才方面，益文学校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由于属于商业学校，益文学校侧重英文、商业知识的教育。因此该校学生毕业后，分散于诸多近代行业中，比如在海关、邮政、公司中服务者居多，在政界供职及致力教育者也很多，而进行国际贸易者尤为该校学生特色。据1922年2月烟台长老会编印的年报供认：“毕业生，在各岗位的成绩是很多的。……烟台最大的进出口商是我们的学生；发网工业是我们的学生介绍的；发网染色和漂白是我们学生试验成功的；烟台最大的机器商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毕业生在美国各部门都有，一个干纺织工业，另一个搞农业，还有一个是化学工程师”“……值得骄傲的是有两个学生被选为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的秘书。”^②1937年1月出版的《烟台概览》对益文学校的学生情况记载说：“该校学生就业在海关、邮政、银行公司中服务者居多。在政界供职及致力教育者，亦颇不鲜，而远向外国经营贸易者，尤为该校学生特色，有益文学生足迹遍五洲之称。”毕业生踏上社会后，“甚博社会欢迎，民初以后该校声誉大振，遐迩闻名，竟有由东三省及长江以南各省市学生不远千里而来求学者”。^③

狄考文创办蒙养学堂时，只招收六名“素寒不能读书”的孩子教以读书。但不断发展的登州文会馆，却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1898年清政府维新改革，创办京师大学堂，选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一人担任汉文教习。1901年，山东大学堂便是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汉文教习

^① 雷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② 侯孝坤：《烟台二中前身——益文学校》，《烟台市文史资料》第一辑，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编印，第193页。

^③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出版发行，第61页。

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仅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的。结果,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①据统计,“从1876年至1910年,文会馆共培养学生208人,其中有104人担任各地学堂的教习,分布在全国各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官立学堂”^②。“京师大学堂之外,全国各省(除贵州)的大学堂;工、农、师范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科学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等,以至保定武备学堂及师范学堂,奉天,云南讲武堂等,都聘有文会馆的毕业生。因此,对于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会馆贡献很大。”^③其中,就职于京师大学堂的文会馆毕业生,每人月薪有白银30两,可见身价之高。

烟台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为中国近代医院输送一批有较高护理水平的护士。自1926年至1944年,共毕业19届学生150余人,毕业后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工作在华北各地的医院里,皆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声誉。

各教会学校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发展输送了人才。“五四”运动中,实益学馆的学生曾积极参加山东省学生总会,联合28所烟台中小学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为了抗议外国人把持校政,益文学校的学生还多次罢课。20世纪20年代,“校中曾发生罢课三次。第一次因学生在校中设立同乡会,奉天学生被革;第二次原因细微;第三次发生在民国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因为新聘之外人压制学生,致使双方决裂。学生离校者计二百余人云。”^④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教会学校学生投身到抗日宣传中,有些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的前线。比如益文学校组织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烟台著名才女王隽英,自幼就读于烟台会文书院小学部、真光女中,后考入燕京大学。三十年代,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她还撰写《告妇女同胞书》,“举木兰之剑,秉文姬之笔,效庆龄之爱心……”^⑤号召妇女允文允武,争当巾帼英雄;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的有志青年也冲破敌人的封锁,进入后方,为抗战服务。总之,教会学校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革命先进分子。

4、倡导社会改良新风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存在很多的陋习,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了极消极的影响。广大民众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重的一类人,其中女性尤甚。他们往往成为社会陋俗的牺牲品,是最丑恶现象的直接受害者。近代传教士在中国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教会命令戒食鸦片、禁酒、禁赌、禁嫖,同时也在教育活动

^①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第4页。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③ 于中旻:《狄考文与中国哈佛大学》,《翼报》,2004年第四期。

^④ 郑千里:《烟台要览·教育》,烟台:烟台要览编纂局1923年出版发行,第282页。

^⑤ 《烟台晚报》,2008年8月28日,第13版。

中大力推进社会风俗的改良，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社会风气。

传教士激烈抨击了中国妇女缠足的野蛮恶习。由于缠足陋俗摧残了人体正常的机能，并不利于妇女走出家门进入教堂或学校，不利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再加上他们认为女子缠足是违背自然的行为，对于女性身心健康存在不利影响。因此，他们在兴办近代教育过程中，还在女校里发起反缠足运动。如在登州女子学堂中，倪维斯夫人号召反对旧的封建习俗，主张“天足”，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民众素质。^①后来，倪维斯夫人成为山东烟台天足会的主要负责人。有的学校则严令入学女性必须放足，否则取消其入学资格。其中，烟台花边学校中，马茂兰夫人耐心地教导那些新放足的学生，他们用按摩的方式促进脚的恢复。在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的入学须知中，专门有一条规定，“女性必须未婚，亦未进行过缠足”。

但是，清末民初，先进人士发动的晚清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都曾提倡放足，但都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传教士们提倡放足必定会受到很大的阻力，但这种破除陋俗的倡议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教会学校影响的逐渐扩大，对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此外，传教士们还强烈反对纳妾、重婚，将这一制度描述为“令人作呕的秽秽行为”。在中国的纲常伦理和封建家长制下，青年男女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失去了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传教士们一般都积极支持女信徒和女校的学生反抗封建包办的婚姻、童养媳等陋习，主张妇女婚姻自主。例如，马茂兰夫人就曾支持并帮助花边学校的一位名叫“玫瑰”的女学生推掉了家庭为其包办的不幸婚姻，取消了与其岁数大一倍多的身体也不健全的未婚夫，并将该女收为义女。这位女学生不但受到马茂兰全家的格外爱护，还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在马茂兰夫人的祝福下，找到了自己理想得归宿。^②此外，传教士们还坚决反对中国近代社会上颇为盛行的溺婴、弃婴之风，他们在旗帜鲜明的批判同时还建立孤儿院，亲自收养这些可怜的婴儿，

在教会学校中，传教士在思想和生活等方面也对学生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在婚礼习俗上，也出现了中西结合的婚礼方式。花边学校的学生们结婚时，大多不再像过去一样头戴镶着各种假宝石得凤冠，面罩红布，人不见其貌，新娘前行还要人搀扶的老习惯，而学西方人改用轻纱罩面等等。

面对中国民众的体弱病态和体育活动的匮乏，传教士还积极引入近代体育项目，在学校广泛推广，以健全学生体魄。比如益文学校的足球、篮球运动等，影

^①【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 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版，第 233 页。

^②【英】穆马快乐（Gladys McMullan Murray）：《我的一生》（China Born），曲拯民译，[伯克利]福音文宣社 2002 年版，第 67 页。

响较大。崇正中学还要求学生“每日除正课外，均应运动一小时，以求体育之普遍。”^①传教士还积极提倡女性体育运动，增强女性体质。各教会女校除了普通的文化教育外，也注重体育锻炼。比如，崇德女中专设体育教员一名，童子军训练员一名，专门指导学生运动，在体育科目时间外及课余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有纪律的课外运动。^②马茂兰夫人的女儿担任花边学校的体育教师，自制瓶状棒、哑铃、竹杖、铁圈子等体育用具，鼓励学生参加课外锻炼。很多女学生都乐意参加体育班，因人数众多，只好分班进行。后来的培真女子学校则要求学生练习各项球类，以及各种柔软体操，以锻炼体质，开阔心胸。各项体育项目的推广，为近代体育项目的普及和增强民众的体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由于“中国社会数千年旧习积重，难有稍许改变”^③，再加上传教士所改变的旧习俗大多是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的些许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放民众的思想，真正起到社会风俗改良的效果。但传教士的活动在客观上支持了民众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为近代烟台社会的改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历史局限性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文化的传播受到传播者和受传播者两方面的影响。当传播者传播一种文化的时候，并不是仅仅客观地、真实地把这种文化传播给受传者，相反，他们往往会掺杂自己的理解甚至自己的价值观念。传播学的这种原则恰恰适用于近代西学传播。而近代西学在烟台的传播，传教士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传教士的个人素质、价值观和利益追求都很大的影响了西学传播的面貌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效果。而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教，办理教育只是其传教过程中的一种方式。对于传教士办理教师事业的目的，狄考文曾公开宣称：“传教士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来办教育的。”^④，由此可见，教会学校的基督色彩是非常浓厚的。教会学校虽是不同的教会所办，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但在办学过程中都遵循了这个宗旨。无论在制定培养目标方面，还是在确定课程设置、安排教学内容等问题上，教会学校最关心的仍然是其对于基督教的发展是否有利。宗教价值观和强烈的传教目的使他们无法客观地介绍西方文化。

在教会学校中，虽然开设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程，但是囿于办学目的的局限，宗教课程就成为其教学的重心。宗教科目不仅繁多，而且所占学时很多，除了《圣经》外，有关新、旧约圣经的历史和道理都详尽地教给学生。除了正式

^①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 1937 年 1 月出版发行，第 98 页。

^②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 1937 年 1 月出版发行，第 101 页。

^③ 孙一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 页。

^④ 朱有瓛、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4 页。

上课外,每日的早祷、晚祷更是必不可少。教会学校用一切手段向学生灌输宗教知识,实施精神渗透。教会女学的局限性较为明显。1893年的第一次山东传教士大会上,狄乐播^①将兴办女学的原因阐述的明白无误:“第一,让女学培训未来的母亲;第二,女学要为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培养合格的妻子;第三,女校要为教会的妇女工作培养师资力量。”而教会女校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至少有三件事是必须做的:“其一,为了有足够长的时间给外国教师以影响,塑造顺从基督的品格,女孩入学的年龄越小越好;其二,女校的学生要有一技之长,例如烹饪、刺绣、缝纫等;其三,她们注定要过基督徒式的生活。”^②一言以蔽之,教会女学的办学目的在于将中国妇女培养称为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

传播学认为,传播活动产生预期效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即“信誉性”。传播者信誉性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在接收者心目中的形象。而传教士是伴随着血与火大批来华的,他们与中国民众之间本身就缺乏起码的信任。大批中国民众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去看待传教士的各种活动,因此教会学校自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虽然各类教会学校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烟台教育制度改革的先河,但其既没有为基督教的发展铺平道路,更没有培养出足以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领袖人才。教会学校所折射出来的新式教育的曙光,连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民众反教会情绪淹没了。再加上烟台经济落后,封建文化根深蒂固,人们很难产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如登州文会馆中,19世纪70年代便有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内容虽好,但除了能去教会学校教书之外,此类知识几乎一无所用。此外,传教士把基督教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狄考文曾公开表示:“传教士是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基督教的婢女带到中国来的”^③。要想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必以信仰基督教为代价,这是教会学校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因此,相当数量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无不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因此,教会学校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学、解放思想和培养人才的作用,但由于教育服务宗教的宗旨,传教士们在从事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以传教的功利主义代替科学发展和文化传播的规律,以神学自然观和宗教社会观解释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现象,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夹带宗教说教,大大限制了教会学校的发展,也降低了其培养人才的社会功能,且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教会学校一直缓慢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① 狄考文之四弟,在狄考文感召下,于1881年至登州,从狄考文学习汉语,并帮助办学,后来去淮县办理格致院和文华馆。

^② [美] R. M. Mateer, *Primary Education for Girls. Record of the First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Ching-Chow fu*, 1893.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NO.72-74.

^③ 张书丰:《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12月,第88页。

附录

一、图表

1、近代烟台教会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所属教会	时间	备注
文先小学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866	
会英小学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866	
中国内地会子女学校	中国内地会	1882	1885年,男生、女生独立设校授课,分为男校、女校
启喑学馆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887	初址登州,1898迁至烟台,1906更名烟台启喑学校
内地会小学部	中国内地会	1895	
会文书院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896	由文先、会英小学合并而成
英文学馆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897	1911年后更名实益学馆
毓璜顶女校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05	
卫灵女校	基督教美国南浸信会	1906	初中(三年制)
焕文学校	基督教美国南浸信会	1912	1924年增设中学部
西山幼稚园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12	烟台幼稚教育最早发端
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培训学校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14	1926年更名为毓璜顶医院附设护士学校
育才商业职业学校	基督教青年会	1914	商科(三年)、预备班(一年)
崇正小学	天主教	1914	立案小学,分初级、高级两部
崇正中学	天主教	1914	初中三年制
信育小学	基督教葡萄山会	1915	
培真女校	基督教奇山会	1916	初中三年制
崇德女中	天主教	1918	高中(二年)、初中(三年)
毓璜顶幼稚师范学校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19	20世纪20年代末并入真光女中
爱道女校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20	
益文学校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20	设商专、高中、初中三部
真光女子中学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23	设师范(一年)、初中(三年)
信义小学	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	1923	
基督教女青年会幼稚园	基督教女青年会	1925	设三班
崇真贫民小学	天主教	1926	
东山小学	基督教东山教会	1927	
爱光小学	基督教自立会	1929	
崇正中学	天主教	1931	初中三年制
崇德幼稚园	天主教	1933	
张家窑小学	天主教	1934	
法国小学	天主教	不详	
卫灵幼稚园	基督教美国南浸信会	不详	学生缴纳学费为资金来源
爱光幼稚园	基督教自立会	不详	学费募捐为资金来源
培真幼稚园	基督教奇山会	不详	

(根据辛俊玲《近代烟台教会学校论述》,《烟台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1月版资料综合而成)

2、1920 年代烟台市各国侨民一览表

国别	男	女	合计
日本	986	677	1662
英国	84	122	205
美国	51	75	126
俄国	30	33	63
意大利	8	4	12
德国	15	16	31
瑞典	1	1	2
挪威	2	2	4
西班牙	0	2	2
波兰	2	3	5
罗马尼亚	1	2	3
希腊	4	2	6
爱沙陶尼亚	1	5	6
比利时	1	1	2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 页。)

3、20 世纪 30 年代的烟台基督教各团体组织表

团体	地点	成立时间	备注
查经处	新民村	民国二十年	以研究圣经为宗旨,会员百余名。
葡萄山教会	葡萄山路	1893	由卜尔奈(英)牧师主持,会员 700 余名,附设布道团及男女小学。
浸信会	大马路	1916	由牧师慕雅各(美)、杨美斋主持,会员 700 余名,附布道团、焕文学校、卫灵女校、福音堂及诊所。
毓璜顶教会	毓璜顶	清光绪年间	会中牧师 11 人,长老 3 人,会员 830 名,附布道团、幼稚园、益文学校、爱道院及医院
救世军	西马路	1921	会员 164
奇山会	三马路	1902	会员 479,附福音堂、配真女校及男校
西南关教会	西南关	民国八年	华人自办,附设爱光小学及幼稚园
东山教会	大马路东	1878	牧师扶学富(英),会员 298,附设男女小学两处

(据刘精一所著《烟台概览》资料整理而成。)

4、烟台毓璜顶医院护士培训学校历届毕业生名单

年份	名 单
1914-1926	毕业生共计 20 人，具体名单无记载
1926	冷书章、李世英、王风翱、王让礼
1927	生玉珍、马风蓬、赵光珍、赵贵蓉、张寿峰
1928	孙英环、郑均
1929	管桂美、沈伯祥、孙景哲
1930	姜悦兰、曹秀蓉、毕庶谷、丛振国、王裕珩
1931	赵继恩、杨宗顺、李志仁、李料贵、宋贵芝、孙闰郁、罗振球、王惠英
1932	宋耕九、赵熙升、张淑玉、李昌惠、李鉴全
1933	张秉和、朱美玉、曲慎容、张汝君、栾乐义、董玉英、王孟光、孙瑞珊、管润岫、郭世恩、生刚
1934	王玉洁、范伯云、于芳蓬、刘纪威、龚泉生、毕华桢、杨世春
1935	宁以诺、孙兰香、于泽民、张玉兑、郝美玉、张宝田
1936	王璞真、于淑真、李悦兰、张次炬、谢美玉、侯文秀、王文玉、刘安礼、赵嗣宝、丁志渊
1937	郭淑蔚、孙佑华、张鸿玉、曲羨真、王修珍、梁秋香、杨淑贞、陆馥珍、孙云荔、谢莉莉、徐修梅
1938	宁善果、郑创文、刘全德、赵玉英
1939	高慕文、赵又洁、丛秋溢、邹积瑗、许桂梅、张庭芳、李春华、葛昌
1940	房出领、李珍然、高俊儒、罗振奥、李馨源、韩竞雄、孙佩德
1941	宁爱丽、王婉梅、宋惠英、曲天民、陈恩荣、杨洁琛、张素贞、郭淑德 汪淑芳 王淑美 石志明 姜义麟 郭芳琳 葛许植 乔玉洁 王云梅
1942	邱豁玲 李竹青 李义青 孟宪洵 王芳明 王淑章 王玉珍 杨怯红 袁协治
1943	张金英 张国琴 赵玉玲 陈育芝 姜树仙 楚新启 侯五旬 管秋英 刘爱卿 尚美善 孙建兰 段美丽 滕爱兰 王素芝 高玳辉 李青春 于培梅
1944	戚志英 贾美琳 徐雪英 梁蕊圣 梁淑英 刘秉娴 宋美丽 孙淑青 王美丽 王从真 武肇文 王恩惠
1945	毕业生 20 名，名单全缺无从查询

(根据《八十春秋 1914. 10. 30—1994. 10. 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第 102—103 页内容综合而来。)

参考文献

一、文献资料

- 1.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第 4 期。
- 2.政协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芝罘文史资料》第 4 辑，1989 年版。
- 3.《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 1891 年版。
- 4.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 1 辑，1982 年版。
- 5.范约翰：《上海清心中学滥觞记》，《清心两级学校 70 周年纪念册》，1910 年版。
- 6.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12 辑，1990 年版。
- 7.《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 19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9.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10.侠僧：《吾校近年来之概况》，见《益文商专己巳级刊》，1930 年第 2 期。
- 11.《八十春秋 1914.10.30—1994.10.30》，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1994 年出版（内部刊物）。
- 12.（台湾）《山东文献》第十五卷第四期，台湾文献委员会 1964 年版
- 13.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 2 辑，1983 年版。
- 14.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 8 辑，1987 年版。
- 15.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四辑，1985 年版。
- 16.《山东省各县市 19 年度教育报告》第四册，山东省政府教育厅 1932 年印
- 17.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5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18. 山东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9年第1期。
19. 《中华基督教教会年鉴》第一卷，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1914年版。

二、地方志

1. 中国年鉴编撰委员会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丁），宗青图书公司1932年版。
2.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外事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 刘精一：《烟台概览》，烟台：胶东卅字报烟台概览编辑处1937年版。
4. 王元德、刘玉峰总编：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淮县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印。
5. 万邦维、卫元爵修《莱阳县志》第3卷，清康熙17年(1678)版。
6.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教育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三、相关专著

1. 中国美国学会编：《“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
2. 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曲拯民：《烟台教育发展史话》（1865—1945）（非卖品），烟台图书馆藏书。
5.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6. 王旋主编：《烟台历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
7. [英]法思远主编：《山东——中国的一个神圣省》，郭大松译，上海广学会1912年版。
8. 唐逸主编：《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美]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著：《掘地深耕——郭显德传1835-1920》，小光译，台北市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
11. [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14.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版。
15. 孙祚民：《山东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6.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天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 17.郑千里：《烟台要览》，胶东新报社 1924 年版。
- 18.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19.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 4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20.连敬斋：《郭显德牧师行传》，上海广学会 1940 年版。
- 21.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 年》（下），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 1982 年版。
- 22.[法]费赖之：《入华耶稣会上列传》，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
- 23.[英]阿美德（A. G. Ahmed）：《图说烟台（1935-1936）》，陈海涛、刘惠琴译，齐鲁书社 2007 年版
- 24.张力、刘鉴堂：《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25.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 1922 年版
- 2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27.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28.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 29.雷波：《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 1993 年版。
- 30.[英]穆马快乐（Gladys McMullan Murray）：《我的一生》（China Born），曲拯民译，[伯克利]福音文宣社 2002 年版
- 31.孙江：《十字架与龙》，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四、参考论文

- 1.朱冬梅：《西方基督教与近代山东女子教育》，《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 2.滕松梅：《基督教会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1 期。
- 3.蔡玉臻：《登州文会馆》，《春秋》2003 年第 3 期。
- 4.曹立前、郭大松：《传教士与烟台启喑学校》，《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 5.张书丰：《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0年12期。

- 6.赵海涛：《美国在烟台的传教事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未出版版本，2007年4月。
- 7.陆著：《鸦片战争后教会女塾在中国的兴起》，《史林》1990年第4期。
- 8.顾邦文：《近代中国女性与基督教启蒙》，《当代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
- 9.陶飞亚：《登州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 10.辛俊玲：《近代烟台教会学校论述》，《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 11.邓云：《来华传教士与近代烟台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5月。

五、报纸资料

- 1.曲拯民的《中国最早的一间大学》，美国《亚省时报》，2002年2月15日。
- 2.史直：《郭显德博士传奇》，《翼报》第11期，2005年6月。
- 3.曲拯民：《中国全国最早的聋哑学校》，《翼报》第36期，2007年7月。
- 4.于中旻：《狄考文与中国哈佛大学》，《翼报》第4期，2004年11月。

六、外文资料

- 1.[英] James and L. McMullan, *The 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 R. C. Forsyth, comp. and 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 2.[美] R. M. Mateer, *Primary Education for Girls. Record of the First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Ching-Chow fu*, 1893.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4.

致 谢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我要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言，就是感谢我的导师赵兴胜教授！导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问的执着追求精神，以及谦和质朴的师德风范，正直热情的做人原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也是我一生都受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在整篇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导师给予我大量的指导和帮助，无论论文的选题、材料的取舍还是理论的构架，甚至字句的斟酌，直至论文定稿无不凝聚着导师的心血。没有导师的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和热情帮助，我的论文就不可能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谨向导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你们科学的管理模式，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的服务理念，在我学习阶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校期间聆听了山大著名的历史文化学者的讲座和专题报告，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 25 本必读书和每次作业，使我学习到了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素养。

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以及有关网站的内容，在此一并真诚地感谢所有参考文献的作者。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生活、学习上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也无法顺利完成学业。

由衷地感谢评阅论文的各位专家、教授，对论文的不足之处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感谢参加我论文答辩的各位评委。

攻读学位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1、《利用第二课堂, 选准高校辅导员工作在学风建设中的着力点》，《克山师范学报》2007/03
- 2、《大学生创新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青少年研究》，2005/04
- 3、《高校学生宿舍搭配起素质教育平台的浅述》，《高校后勤研究》，2006/01